

苏联：

一百个问答

您认为改革的革命性何在？

苏联通过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决议。这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如何？

在苏联将怎样讲授苏联国家史？

贵国如何对待环境保护问题？

号召进行新的政治思维，是否仅仅是一纸宣言呢？



目 录

编者的话

一、经济与政治

现在特别重视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哪些问题？	8
为什么苏联社会把苏共第二十七大的决议视为是革新的？	9
您认为改革的革命性何在？	10
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同最近几年举行的其它党代会有何区别？	10
众所周知，苏联开始了经济管理改革，这是由什么引起的？	12
苏联是怎样对待市场调节问题的？	12
竞争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经营原则？	13
苏联的工业企业有权走向国外市场。这是否意味着取消了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呢？	14
苏联是否准备把卢布改作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15
苏联会出现失业现象吗？	16
苏联是否将关闭亏损企业？	17
苏联为提高产品质量采取了哪些措施？	18
贵国现在关于集体承包谈论得很多，集体承包是什么？	19
什么是跨部门科技综合体？	20
贵国是否有培训工业经理人员的系统？	21
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否影响了苏联核能发展计划？	22
苏联是否利用非传统能源？	23
不久前苏联公民被允许从事个体劳动，这该怎么理解？	25
最近贵国非常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集体的农业经济得不偿失？	26
苏联为提高本国农业的效益在做些什么？	27

集体农庄的新章程同以前的章程有何区别呢？	29
贵国对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是否感到满意？	30
二、民主	32
苏联通过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决议。这一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如何？	32
你们说必需使党机构民主化，加强对其活动的监督。具体指什么？	34
你们一边说扩大劳动者的权利，一边又说到国家的巩固。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	35
苏联准备怎样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36
苏联如何评价本国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选举结果？	38
您就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能说些什么？	39
苏联工会在改革条件下起何作用？	40
你们认为“劳动集体自治”意味着什么？	41
每个苏联工人都持有劳动手册。这是什么东西？	42
贵国的生活中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也涉及到文艺领域？	43
苏联文化生活中目前的变化是否来自“上面”的改革？	45
在苏联将如何讲授苏联国家史？	46
苏联出版刊物是否有限制？	47
苏联有多少报纸和杂志？其中哪些出版量最大？	47
听说苏联纸张紧缺，这是否影响儿童书籍的出版？	48
贵国电视观众最喜欢哪些节目？	49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电影的观看人次显著下跌，贵国是否也有这个现象？	50
苏联报刊经常报道有关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和其它违法行为。原因何在？	51
在苏联向法院起诉有哪些规定？收费多少？	52
苏联法院采取哪些惩罚措施？	53
苏联正在改革刑事法典，原因何在？	53
新的刑事法将是什么样的？	
苏联是怎样拟定新法律的？	54
贵国有外国法律委员会，它有哪些职权？	55
苏联对战犯持何立场？	55
苏联限制自己公民出国是真的吗？	56
苏联人是否能同外国公民结婚？	57

在苏联是否可以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	57
苏联国际旅行社为自己的客人提供哪些旅游线路？	57
哪一些人和怎样能到苏联留学？	58
苏联青年公民可以在西方休假吗？	58
苏联大学生在假期被迫到建筑工地劳动是真的吗？	59
什么是非正式青年组织？你们是如何对待它们的？	59
你们说，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但最近贵国发生的事件说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就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什么看法？	61
贵国信教的人数是否增多了？	62
贵国是否允许出版和传发宗教刊物？	62
贵国是否有培训神职人员的系统？	63
三、人与社会	65
最近贵国有关社会公正问题写得很多，你们是怎样理解它的呢？	65
苏联怎样解决培养新人的问题？	66
为什么苏联常说必须生产更多的日用消费品和提高其质量？这是否说明贵国的消费思想占了上风？	66
苏联人真的能有储蓄吗？	67
苏联公民交纳哪些税？	68
工人工资中扣除用于社会保险的金额是多少？	69
在苏联报刊上进行过修改养老金法的讨论。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69
年轻家庭的预算由哪些资金组成？	
他们是否能依靠自己的钱来维持家庭？	70
苏联是否存在住房问题？	71
一个苏联家庭有权购买房子吗？	72
私人住房值多少钱？一般的普通家庭买得起吗？	73
贵国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小轿车来满足私人用途？	73
苏联人为保健休息拥有哪些条件？	74
苏联庆祝哪些节日？是否存在民族仪式和风俗？	75
苏联人口前景如何？	76
不久前苏联创建了儿童基金会。这个组织对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	78
有些人说世界上的文盲在减少。另一些人说相反，它在增加。到底谁对谁错？苏联的情况如何？	79

贵国如何对待环保问题？	80
是否可以说在苏联吸毒如同在西方一样普遍和危险？	81
苏联运动员可以划归为哪一类：职业运动员还是业余运动员？	82
四、对外政策	84
贵国目前在国际关系中采取的新态度是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84
号召进行新的政治思维，是否仅是一纸宣言呢？	85
为什么西方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接受新政治思维原则？能否谈谈你们的看法？	86
军事上的均衡是否能成为普遍安全的可靠基础？	87
贵国是否想把美国排挤出欧洲？	88
苏联时常强调，似乎西方塑造了和至今仍在塑造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苏联公民的形象。依你们看来，是否存在摧毁这种刻板形象的可能性？	89
你们是否认为巩固和平的问题首先应由大国来关心？	90
苏联如何看待不结盟运动？	91
苏联说在解决亚太地区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态度。具体地表现在哪里？	91
苏中关系发展的情况如何？	92
苏联人民是否了解中国今天在联合国的活动情况？	93
苏联报刊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面有多广？	93
苏中两国的文化联系的发展情况怎样？	95
苏联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关系如何？	96
苏联对近东问题采取何立场？	96
苏联对南非问题的政治调解取得的进展持何态度？	98
贵国如何评价在中美洲的和平调解进程？	98
经互会和欧洲共同体看来是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联合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99
参加经互会的不仅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也有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是否拉平它们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	101
贵国对创办联营企业的初步经验有什么看法？	102
苏联和平基金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其活动基本方向有哪些？	103
众所周知，苏联参与许多宇宙空间研究计划。是否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一下这些研究的前景？	104

编者的话：

新闻社出版社根据国外读者的来信再次出版《苏联：一百个问答》这本小册子。在最近的来信中，大部分问题涉及到在我国进行的更新过程。外国读者对苏联的社会生活、苏共的活动更感兴趣了。他们要求我们对各种国际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下面，我们继续用同读者进行对话的形式，来回答一些有关苏联内外政策方面最常见的问题。

一、经济与政治

“现在特别重视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哪些问题？”

“要想简单扼要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日益趋向复杂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就连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无法预见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时甚至无法预见它们的产生。

这些问题之一，是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众所周知，列宁在当时曾提出过设想：每个国家将各自沿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

今天，当代表着两个社会政治体系的两大军政集团的对峙，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结果时，对列宁的这个在政治上极其精确的结论需要加以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和平共处和意识形态竞赛的相互关系；

——适合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

——在政治结构和传统不同，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特殊性；

——资本主义放弃军事对峙的可能性。

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生活的问题。这里指的是，例如，政治经济问题：全民的、合作社的和个体形式的所有制的相互关系；集中管理和个别企业主动性的相互关系；经营管理人员选举和任命的相互关系。

今天，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问题：多元论及其限度，在议会制度中传统的和社会主义本身的（更广泛地说，

即所有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工作)相互关系;自治、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新的社会主动性和国家活动的传统形式;工人阶级的新评述;个人、社会集团和专业团体、各阶层利益的和谐和一致。”

“为什么苏联社会把苏共第二十七大的决议视为是革新的?”

“苏联党史中的历届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在苏联人民生活中曾占有特殊地位。例如，八大（1919年）通过了第二个党纲——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十大（1921年）批准了列宁拟订的新经济政策。二十二大（1956年）揭示了造成个人迷信的原因，并对个人迷信作为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加以谴责。

第二十七次党代会（1986年）制定出一条崭新的政治路线，旨在对我国的全部生活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加快社会的发展。大会通过了党纲的新文本。

自然，这里不能做最后的总结，否则就是错误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通过的旨在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中消除停滞现象的决议，将会日益促进苏联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始了。但它进行的速度比所希望的要慢。改革遇到的障碍是以前没有考虑到的或只是考虑到其中一部分，或者没有全部把它揭示出来，尽管大会指出了阻碍革新的所有缺点。

在国内懂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和矛盾重重的过程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改革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但实际上我们才刚刚起步。”

“您认为改革的革命性何在?”

“从实质的深刻性、布尔什维克的大胆精神、人道主义的社会针对性来说，现在的方针是列宁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开创

的伟大事业的直接继续。而且不是简单的继续，是基本革命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列宁曾写道，历史上还未有过那种可以把争取来的革命放进口袋，躺在桂冠上安于既得的成就的事。社会主义的责任是在社会里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加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上的变革。那么，为了发挥自己的潜力，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越过几个革命转折点呢？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也避免不了停滞趋向的出现，甚至避免不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为了摆脱危机和危机前夕状态，需要采取的正是根本改革主义的措施。

“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同最近几年举行的其它党代会有何区别？”

“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各个方面都有区别，具体说，在于讨论问题时的具体性和迫切性，在于辩论的无拘无束和尖锐性、多样性，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对立的观点，在于被通过的决议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决议付诸实现的速度。最后，看来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不同于以往会议的最突出特点，是公民确实对国家共同事业表示关心，对选举参加会议的代表，对代表大会所进行的辩论及其通过的决议表示关心。

1988年6月底至7月初，开了4天的（许多人为时间短感到遗憾，没能让更多愿意发表意见的人发言）第19次党代表会议甚至同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27大相比，认为是一个沸腾着的政治生活舞台。而第27大是在宣布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和在苏联更新社会主义方针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

这是一场**改革**的大会。更新社会和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

党摆脱用行政命令方式解决自身和社会问题的束缚的方针，是在27大上经过对政治、经济、社会任务的各种方案进行了对比之后制定出来的。

这是一次**社会主义多元论观点**的大会。代表们不仅相互争论，而且也同党的高级领导人，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了争论。

这是一次**民主化**的大会。争取民主的程序还在选举参加大会的代表时开始的。会议表现了当今苏联社会上存在的所有观点：从保守的到颇为极端的观点，从乐观的到谨慎的观点。代表会议的某些决议也不是一致通过的：有弃权的，也有反对的。

这是一次**公开性**大会。发言人不仅涉及到禁止批评的，而且在停滞年代不准提及的课题，甚至涉及到在大会开幕前还存在的禁区。

这是一次**新思维**的大会。新思维表现于大会上讨论的国内外问题。大多数代表为解决已积累的问题寻找新的方式，妥协的途径。

这是一次**社会主义更新**的大会。有关社会主义的旧的、教条式的（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总是自觉地借用了斯大林的好坏之说）思想，在新的先进的当今科学思想的观点面前一败涂地。”

“众所周知，苏联开始了经济管理改革，这是由什么引起的？”

“这一改革是我国进行的更新、改革总过程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前形成的经济管理体系已经不符合新的要求。它开始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

首先，由于集中管理——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优越性——在一定阶段上变得过于臃肿。计划领导是以行政命令方式来实现的。这个体系基本上是在战前年代形成的。在某些方面这是同当时的特殊条件有关，即为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和达到最高的

增长速度，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在同法西斯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和战后国家的迅速复兴。

但是后来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机制实际上没有变动。虽然在60—70年代也有过完善它的尝试，但其带有模棱两可的、不彻底的性质。这种‘惰性’的发展导致了问题的积累，使社会经济变形，从而也就越来越影响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

采取个别措施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因此需要彻底的改革。苏共27大阐明了这一思想，而苏共六月（1987年）全会说明了具体纲领。改革的实质在于管理民主化，在各级水平上向主要是经济方式领导过渡。经济改革基本上应于1991年结束，以便从下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的国民经济转向新的管理体系。”

“苏联是怎样对待市场调节问题的？”

“有一段时间苏联对市场的作用评估过低，甚至根本就否定它的作用。对‘市场’这个词本身也采取否定的态度。当时存在着一种简单化了的看法，仿佛可以用集中方式预测和考虑到一切。自然，这种态度使人越来越感受到其产生的不良后果。

苏联进行的根本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根据市场的规律掌握和管理市场。这并非等于‘靠近’资本主义或‘偏离’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也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其实质不以现有的市场来决定，而取决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这里指的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经济的计划管理条件下发挥社会主义职能的市场。

在集中计划不能保障足够效益的地方，市场的作用就增大，例如，在消费、服务领域中，在农业、轻工业和一系列加工部门，市场成了制订计划的定向标之一，就是说，它不是计划的对立物，而是同计划相辅相成的。

同时，比如，在重工业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集中下达的任务。战略性投资方针，开发自然资源和新区的长期规划，基础科研的方向，都不能取决于市场的行情。”

“竞争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经营原则？”

“我国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是不存在竞争余地的。还在不久前，提到它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虽然有些经济学家早就坚持，在苏联的条件下竞争的可能性和其对经济机制的有效推动的看法。开始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竞争的客观性固然重要，但仅这一点是不够的。应当为此创造条件。一方面能使它正常发展，另一方面要使它活动不是破坏，相反，起创造作用。目前，竞争受到限制。例如，有1100个企业是生产我国1800多种产品的唯一的一些单位，其产品价值达110亿卢布。结果，这样的‘专业化’导致了一切服从于生产者，运输费用过大的情况。

生产同类产品的那些企业，暂时还受到强大的保护，不受竞争的危害。因为各企业产品的销售得到保障。产品按调拨计划在消费者间进行分配。而消费者——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不得自主，不管他们要不要这些东西，一律得收下，并且按惯例，以对生产者极合算的稳定价格购买。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一垄断，变当今生产者的市场为消费者市场呢？在这一方面准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其中之一，是从统一调拨过渡到自由的批发贸易。消费者将有权选择他所需要的商品，而不是购买那些强加于他的商品。向批发贸易的过渡将同价格改革相结合，物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改变其水平，不如说将改变价格形成的原则。消费者将能实际影响价格，而不是象现在那样服从主管部门的支配。

普遍发展合作社也将是打破垄断的一条道路。今后，合作社将能成为不胜任的垄断国营企业的强大对手。如果国营企业站不住脚，那必将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国家也无法挽救它。因为在新企业法中，有让人听来不习惯的措词，即国家不为企业的债务负责，企业也不为国家的债务负责。

竞争应该全力进入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我们重复一下，竞争应当以新的、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以破坏性的力量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我国的经济将不是在自发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而是在同全国性计划相结合的市场基础上发展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新因素，因为，直到最近我们还认为可以单靠计划不靠市场经营。但这也说不上是新的因素：在20年代执行新经济政策时，计划同市场相结合的尝试带来过极好的效果。现在，在回到列宁的经营准则时，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采用科学方法，特别是经济竞赛原则。它同我们社会的性质毫无矛盾。”

**“苏联的工业企业有权走向国外市场。
这是否意味着取消了国家对对外贸易
的垄断呢？”**

“不，不意味。但这一领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

完善对外经济联系结构——首先是扩大机器、设备的出口、发展合作社和其它集约合作的形式——产生了必须把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生产者和进口商品的消费者吸引到对外经济活动中来。国家仍作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骨干，赋予各部的管理机构、联合企业和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职能。

对外经济联系管理的改革，不是一时的法律行为，而是一个有许多进一步明确和修正的过程。但新经营机制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将是不变的——在保持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发展企

业的主动性，以便更充分地利用有利于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的潜力。”

“苏联是否准备把卢布改作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是的，苏联准备这样做。分阶段保障卢布自由兑换的能力，是在苏联已开始的根本经济改革的任务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在参加国际分工方面，象利用合作生产、创办合资企业和同外国伙伴发展直接联系这种合作形式，将会遇到困难。

最根本的问题是，世界外汇市场上的卢布汇率该是多少。我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第一阶段上，汇率应当反映我国实际的竞争能力。因而，还必需考虑到目前我国商品质量低、官僚习气重、拖延交货时间这些方面的问题。

要使汇率发挥正常的效用，不能人为地提高它。这只会遏止出口，自然也就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最初阶段上，只有显著降低会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的卢布统一汇率，才能使它成为有根据的，能‘工作’的。

为确定现实的汇价，已经有一些标准。第一，经验丰富的专家制订的前‘白桦树’外汇卷商店的汇率（这些商店于1988年春被关闭）。第二，按‘黑市’的汇率。第三，按某些西方银行在处理苏联货币的业务时规定的汇率来制订。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调整一下‘黑市’上的汇率，可以把卢布汇率规定在比现有卢布汇率低 $1/2$ — $2/3$ 的水平上。然后，当苏联成品出口的盈利能保障在80%左右的水平上（如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可以得出卢布的最终牌价。看来，今后必须象在中国和匈牙利那样，灵活更动卢布汇率。

应当指出，卢布自由兑换的一些因素已作为既成事实存在着。由于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增长着的卢布总额被兑换成外汇。除此之外，我国同某些国家进行的贸易，是基于以部分卢布兑换成别国外汇的清算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把卢布兑换成西方外汇，实际上已经正在建立的合资企业中实行。”

“苏联会出现失业现象吗？”

“经济机制的改革、劳动集体有权自己支配劳动报酬，将使每个具体的企业有可能撤消缺乏经济效益的工作位置。例如，自从白俄罗斯铁路局采纳了新的组织系统和报酬制后，腾出了12000名工作人员。这项经验被推广到全国各铁路局。其结果，使国民经济有可能更合理地利用数以万计人的劳力。

劳力的腾出过程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进行，非生产领域中也同样在进行。截至2000年，腾出的人数约达1600万。这里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以便让他们从事另一种劳动。任务是很艰巨的。如果苏联考虑的仅是怎样以极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那么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是，仅从经济效益方面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还得从社会方面来解决。这是我国社会提出的要求，是它保障了我们每个人的劳动权。

专设的国家机关肩负解决腾出的劳力就业问题。在新的经营条件下，劳动就业机关将按新的原则组织起来，当然要考虑劳动者的利益。

首先，劳动就业介绍所将转入经济核算轨道。它们保证向企业和机关提供必要的人员，但收取一定的报酬。一部分介绍所（在大、中城市中）正在变为专门的中心。它们的任务不仅在于帮助寻找工作，但也进行就业指导、训练和重新培训。在这个中心的基础上，计划建立经理人员培训班。我们强调一下，介绍所得到的报酬不是劳动者支付的，而是由感到劳力缺乏的企业单位支付

的。对那些需要重新培训或进修的人来说，培训期间他们仍领取月平均工资。

信息系统也在不断完善，它不仅便于寻找工作的人，同时也便于招聘单位。1987年在莫斯科开始发行空额通报。通报分三种：领导班子、专家、职工为一种，工人为第二种，第三种为中學生、大学生、退休人员和家庭妇女（考虑到家庭空闲时间和忙于家务时间的特殊安排，向她们提供一些适宜的劳动——在家劳动、临时性劳动等等）。

从总的就业情况来看，我们对劳力感到紧缺。单是在企业里就有70万个空缺，工人不够。加速发展服务行业具有巨大的就业潜力。目前，苏联在这一领域中的就业人数只占全部就业人数的25%（而在其它发达国家中占50%多）。在现行五年计划（1986—1990年）期间，决定把劳动力资源的基本增长量转到社会文化和生活服务行业。90年代，在物质生产部门就业的部分人也将转到这一领域。”

“苏联是否将关闭亏损企业？”

“这里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利用盈利作为鉴定经济最终结果，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将不关闭企业，而是取消生产。企业将保留下来，但停止其生产的无盈利的产品。企业将生产新的、赢利的产品。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这一点：为了促使产品的更新，对过时了的产品施以强制性的减价。单是以利润和赢利率来计算，那它同关闭企业是没有联系的。

在经营实践中，虽然非常罕见，但可能发生以下这种情况，即，某企业无法搞些多少有盈利的生产。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长期工作不好，管理中有严重失误造成债务累累，无法偿还。

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时，由国家预算补贴并弥补亏损，银行又向它们发放新贷款。在基于完全的经济核算的情况下，补贴将成为例外，只给予那些能提出充分根据的企业。只亏不盈和无支付能力的企业应当关闭。

在采取这个步骤时，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原则性的区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那些从关闭企业中腾出的劳动者安排工作。如有必要的话，还帮助他们掌握新专业。

社会主义同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制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组织手段和经营方式，也不在于它采取的手段，而在于它的目的，在于社会生产服务的那些利益。首先被排除的是剥削目的。实质上，靠工作好的企业来维持工作一贯不好的企业，等于是剥削。”

“苏联为提高产品质量采取了哪些措施？”

“首先增加提高技术水平和保证产品可靠性的资金。

我们对企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提高了国家标准制度的作用，实行了国家产品验收制度。国家验收不仅监督在出厂阶段上的产品，而且如果有必要还协助寻找出现缺陷的原因。除此之外，现有的标准制度还以指标加以补充，这些指标不仅考虑到目前世界科技发展的要求，同时还考虑到其今后发展的要求。

在苏联业已开始的根本经济改革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应同产品的销售直接挂勾。在这种情况下，产品质量低就会直接影响生产者的收入，这能促使他更积极、更快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

价格形成也要根据这一点来加以完善。现在为生产者规定了很可观的各种补贴，而对他们的产品的批发价格实行了折扣。”

**“贵国现在关于集体承包谈论得很多，
集体承包是什么？”**

“应该指出，在建筑单位中，工作队一级的集体承包早在20年前就已实行。问题的实质在于，从规定每人一天的工作任务，其工资也是严格按每个人单独领取的原则向规定整个工作队的总工作量并以其最终劳动成果作结算的原则过渡。例如，在一项工程交付使用后才领取报酬。随之，工作队委员会按每个人的劳动效率支付工资。

但是，由于旧经济机制的作用，这一创举未能得到推广。对基层集体来说，承包并不是完全的经济核算。因为，作业队的上级是工段长，工段长的上级是管理处处长，而管理处处长则又服从于受相应的部或归建筑管理局管理的主管部门的领导。因此，先进的工作方法想在这种严格、集中的多层次的管理机制条件下全面发挥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影响到工资，因为工资的支付并不是按实际完成的工作来支付，而是从早在开工之前，“上面”计划好了的工资基金范围内支付的。

今天，经济改革扩大了承包的范围，使整个集体获得了向新组织形式和支付工资方法过渡的实际可能性。现在集体是为最终结果劳动。拒绝平均主义工资，有效地促使高生产率劳动起质上的变化。随着企业收入的增长，工资和社会发展基金的提成也增长了。

集体获得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独立制定自己所需结构的权利：如改变编制名额，储存用于今后需要的部分资金，同其它单位签订合同，可以不经请示建造自己的社会福利设施。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在推广集体承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客观原因引起的：苏联的经济改革刚刚展开。应当考虑到企业、联合企业、单位，目前还在五年计

划的条件下工作，而五年计划是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前制定的。所有这一切，今天还不允许我们全面利用集体承包的优越性。

主观上的原因是：领导人、专家和一般工人在思维上的改革有一定的困难。

虽然如此，深化集体承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跨部门科技综合体？”

“把广泛阶层的学者、设计师和生产者的努力联合起来，实现经济发展主要方向上的科学工艺突破，是向不久前建立的跨部门科技综合体提出的要求。

跨部门科技综合体一般联合若干研究所、若干设计局、实验性生产单位、若干部门所属工厂。这种综合体协调全国各地属于本领域的工作。除此之外，综合体还进行和协调基础研究，研究有关经互会成员国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的任务。

目前我国有20个跨部门科技综合体。

‘基膜’跨部门科技综合体是我国最大的综合体之一。在现行五年计划期间，通过运用‘基膜’，可以获得不少纯洁度很高的化学物质：氢氧化钠、氨、油漆颜料、大量的蛋白质辅加料。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会带来约10亿卢布的经济效益。

‘基膜’工艺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利用它可以进行无废料生产。

在食品工业中利用基膜的效果，是神奇的。利用基膜对乳清进行加工，可以另外获得大量的蛋白质、乳糖和维生素，而它们又被用来添加儿童营养食品，用于制作奶油、乳酪，肉制品和面包类的食品。

转子式和转子流水作业线前途广大。它们能把各种程序自动化，能把生产效率提高好几倍（有时甚至几十倍），同时又能节

约场地。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推广这一先进技术的任务由‘转子’跨部门科技综合体来承担。在现行五年计划将增加8000多个转子式和转子流水作业线。

科技进步的催化剂是微电子学。其重大任务之一，是用现代化的速效、可靠、小型的个人电子计算机来配备设计师、设计者、工艺师和其它技术工程人员。这个问题由‘电子计算机’跨部门科技综合体来解决。

近视、白内障、青光眼、散光，是最常见的眼疾，使人感到身体有缺陷。‘显微眼外科’跨部门科技综合体的医务人员，把患者放在流水作业台上进行治疗。流水作业台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外科手术中同医生分享了劳动，为医生在工作中运用工业化方式治病创造了可能性。现在，医生治愈的病人不是几十个，而是千计。到1990年初，我国各城市将开设12个跨部门科技综合体分部。

……苏联开设最初几个跨部门科技综合体，还不到两年。可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克服了组织上的困难，此外还有别的问题。但已取得的效果证实，科学和生产的这种结合无疑是大有前途的。”

“贵国是否有培训工业经理人员的系统？”

“我国有这种系统。就拿以下几个城市来说吧。在塔林、列宁格勒、埃里温、敖德萨都设有经理人员学校。报考人很多，因此必须进行考核，以便挑选颇有前途的领导干部候选人。随后进行培训。

在学校里讲授心理学、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和其它经营课程。在讲授各种现代领导人必须掌握的学识的同时，教师对候选人的主动性和精明强干程度给予特别的注意。

教学进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业务游戏。学员有机会在游戏中表现自己作为一个生产领导人怎样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处理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怎样同不及时的供货者打交道，怎样迅速地转向生产新产品，解决利用生产废料的问题等等。

培训结束后，毕业生将被推荐到各领导岗位上。”

“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否影响了苏联核能发展计划？”

“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的事故震撼了整个社会，明显地暴露出核能方面存在的许多缺点。核能所以能达到现阶段水平，是因为进行了几十年的科技探索，对试验性电站的技术解决办法进行了反复的审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原子能科学和技术，原子工业和动力。该部门的发展（为此花费了巨额资金和社会的努力），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了。往后走哪条路？对此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人说，不搞核动力事业是防止一切危险的途径。另一些人说，要走‘超革命’的道路——把它当作一无所用而抛之，尽可能快地创造新的核电站。

积极主张第一种意见的是代表人文职业、‘非原子’专业学者的人和居住在已建成或正在施工中的原子能发电站附近的居民。他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准备和采取最终决定的乃是专家。

今后如何发展原子动力的另一个以极端形式提出的意见是：应当把几十年来建立的反应堆技术、原子能发电站当作一无所用而抛之，依靠新的，不受以往经验束缚的专家，建立新的反应堆。这些反应堆将按完全新的原则和工艺来建造。这种不切合实际的计划犹如否定人类其它领域的活动中已积累的经验一样不切实。

这样不加思索就试图解决原子动力发展的问题，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各个方面作耐心细致的工作。

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原因进行的分析结果，以及在为消除事故后果中寻找必要的解决办法，迫使苏联设计师和物理学家以最快速度寻找和实施能显著提高现有原子能发电站的安全的措施。现在为扑灭反应堆组内起火引起的链锁反应，改善反应堆的性能和改善其排热系统做了很多事。不仅完善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装备的那种反应堆的原子能发电站，同时也完善了带有别种类型反应堆的原子能电站。结果在颇大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可靠性。

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了人员的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暂时转移居住地点。事故带来的损失达80亿卢布。但是，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中也有非常事件发生，并带有悲惨后果。可这并不等于说得禁止坐飞机飞行，停止河上和海上船只的航行，驾驶汽车，也不等于得关闭带有潜在危险的工业部门。社会懂得：没有这一切是不行的。同样，没有能源也是不行的。”

“苏联是否利用非传统能源？”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利用非传统能源的可能性，苏联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实际研究成果。

在重新利用的能源中，苏联比较广泛地利用地球深层热。地下热水在高加索、西伯利亚和我国其它区域被用来取暖。

20多年前，在堪察加（苏联东部地区）建立了地温电站，其发电能力为11兆瓦。它生产的电力成本比同样能力但靠外地运来的燃料生产电力的其它堪察加电站要低数倍。

1986年苏联在巴伦支海上成功地建造了发电能力为400千瓦的基斯洛古勃潮汐发电站。用于实验工业的潮汐发电站（其发电能力为4万千瓦）将保障科拉半岛上的采矿选矿联合厂所需的电力。

苏联生产小功能（不多于10千瓦）的风力装置。它们带有蓄

能器，其容量足以可靠地保障如收音机、电视机、冰箱、小型住房内的常用照明的耗电量。当然这种装置不能同一般的供电系统相比，但在未经电气化的区域，对居住在偏远乡区的用电户来说，无疑是有效的。

现在，同时还在研制一种装有垂直叶片的新型风力发电站，它们沿闭式地面线路运转。1990年前在伏尔加流域中游将建立一座这种类型的风力发电站，有二个各为1000千瓦的机组。

利用太阳能的思想也很诱人。例如，只须从照射在占苏联沙漠地区1/10的土地上‘猎取’5%的太阳能，就要比全国所有电站的总发电量大29倍。可是这里也有很大的限制。太阳能，首先，受稠密度低、气候、季节和昼夜时间的限制；其二，遇到变辐射能为电能的困难。所有这一切，使太阳能的生产变得很昂贵。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和技术工程人员仍在攻这一关。

苏联制订了50多个‘太阳’计划，其中的13个已付诸实现。从1985年起，建造在克里米亚的第一座苏联太阳能发电站开始运转，其功率为5兆瓦。这在生态方面属最‘干净’的电站。就其功率而言，它相等于1954年在奥布宁斯克投产的第一座苏联原子能发电站的功率。

很清楚，非传统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尽管如此，在能量平衡中它们只起辅助作用。”

“不久前苏联公民被允许从事个体劳动，这该怎么理解？”

“在不使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从事个体劳动，以前也未被禁止过。苏联宪法（第17条）允许公民在私人及其家属从事手工业、生活服务行业和一些其它领域中的个体劳动。

1987年个体劳动法生效以来，扩大了其范围和运用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民有权向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领取从事个体劳动的许可证。苏维埃有义务向个体户在提供原材料、销售产品和必需的房舍方面给予帮助。实施了对个体户领取营业执照征税的制度。征税的金额非常低。例如，私人出租汽车缴纳的税款每年才560个卢布，家用电机设备、收音机、皮鞋维修行业，每年征税300—500卢布。

扩大从事个体劳动可能性的原因何在？在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发展中取得一定成就的背景下，生活服务领域不仅过去，就是现在仍处于落后状态。

任何一种个体劳动，在不违犯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填补某些社会经济领域的空白点。例如，我们生产出大批家用电器设备，但却未能为又快又好的维修工作创造基础。由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私人住房、别墅、车库建造的需求量也提高了。而国营建筑单位则却主要忙于自己的任务。

过去，如果相应的国营单位拒绝向居民提供服务，居民就找‘单干户’，但这是非法的。今天，竞争的双方，即：在服务领域中的国营单位和个体户，相辅相成，而这对公民和国家来说都有好处。”

**“最近贵国非常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
这是否意味着集体的农业经济得不偿失？”**

“不，不是这样的。

现在，几乎全部的谷类、饲料和经济作物全由集体农庄、国

营农场生产，再说，这些作物需要大面积的耕地。它们向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业网提供畜产品和果蔬产品。它们供养居民（首先是城市居民），向工业提供农业原料。

今后的方向——建立大型的农业经济。况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指的是较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高一级的一体化形式。例如，正在推广的农工综合体（我国已有30多个），把生产、运输、保管、加工和销售农产品结合起来。综合体在计划和价格形成方面享有广泛权利。它们有自己的商店、建筑单位和财政结算中心（内部银行）。此外还创办农业公司（头四个办于拉脱维亚）。这些公司一般是在一家先进的经营单位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个单位联合数个其它单位。还出现一些农工联合体，这些联合体不仅包括国营成分的企业，也包括合作社成分的企业。

由此可见，正是国营部门保障了国家食品原料储备的基础。

与此同时，苏联为促使个体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率的提高，正在做不少工作。应当指出，过去对个人副业的意义估计过低，使农业经济蒙受了损失。

有一半农村家庭在经营个人副业，其作用很明显：他们生产的产品约占农产品总产量的25%，其中肉、牛奶和鸡蛋占28%，蔬菜占29%，土豆占60%……

产品中的商品部分，私人成分的比重就低——约占10%。换句话说，个体经济中的大部分产品由户主留下自用。国家和集体农庄为使农村和市郊居民提高自己副业产品中的商品率做着很大的努力，使他们感到有利可图，向他们提供帮助（提供饲料、小牲畜、建筑材料、运输等方便）。

国家准备进一步发展社会的和个人成分的一体化，国家把个人成分看作是全国农工综合体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看作是完成食品纲要的主要杠杆。”

“苏联为提高本国农业的效益在做些什么？”

“农工综合体、农工联合体、农工公司等这些一体化的农工系统，已经证实了自己的高效益。但是，目前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备建立农工系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此农工综合体中的主要环节，过去和现在仍是独自经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那么怎样使这些独自经营单位也具有象一体化系统的效力呢？”

从1988年1月起，国家农工体系统大约2/3的农业单位转入经济核算的轨道。换言之，它们开始靠自己挣得的钱生活。

要采取这个步骤，必需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不是在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经济好转的趋向。目前，7000多个经营单位工作亏本，1100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盈利不到10%。虽然如此……还是有充分理由转向经济核算。

首先，经济核算的许多成分在诸如农工综合体、农工联合体等，新型组织经营机构的工作过程中试用过。况且近三年来，我国各区域的一些生产单位都已按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原则工作。此外，还要加上上百个已实行了各种承包形式（集体、租赁和家庭）的经营组织，它们按最终工作成果领取报酬。

换句话说，对新经济机制、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看法，不再是纯理论性的了。

经济管理的基础——计划工作，势必有所变化。它在不断地民主化，劳动集体的作用日益增大。实际上，劳动集体首次开始实施其权利——自行制订和批准本经营单位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时只确定起点数字：生产水平的控制数字、国家定货、长期的经济定额和限额。

供应体制也在改变。正在实施物质技术性产品向批发贸易的

过渡。因为，按以前那样严格的统一调拨原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核算。

为了帮助经营单位较顺利地适应新条件，国家将不仅在物质技术方面给予它们援助，而且还将给予财政上的援助。然而，这种援助也将新的基础上进行。预算直接拨款将显著减少。今后拨款只用于建设和改建费用在400万卢布以上的工程项目、土壤改良、修筑生产单位范围内的道路和一些其它目的。剩余的大部分资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通过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补贴形式获得。对每个经营单位的补贴各不相同，将按生产单位的潜在资源、经济状况进行补贴。自然，哪个单位客观上经济条件越差，得到的补贴越大。

向银行偿还的长期贷款延长10年，而且只需偿还应在1987—1990年付清的贷款总数的60%左右。至于预算提成，今后按利润或净收支的定额计算。

对财政贷款政策进行的修改，为经营单位创造了过渡到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同等条件。这是拉平经济条件的工具，而不是平均主义。在这一制度下，一部分集体的寄生和浪费现象不再由另一部分勤俭劳动的集体来分担。

除此之外，为了使整个经济结构能有保障地正常工作，正在建立集中的保险（储备）基金，并将提成划入这一基金中。基金中的资金用于所有部门的需要，帮助经营单位，赔偿因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其它损失。对所有这一切，国家保险机构是不付给赔偿费的。但是，国家农工体的这种帮助并非无偿的：借用的款项，必须在好年成偿还。

新机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预算提成和集中基金提成都以长期、稳定的定额为基础。在安排这些定额时，考虑到每个经营单位都将有足够的用于发展生产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剩余资金。

新措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措施只是为了在经营中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可能性创造基础的。

当然，某些经营单位尽管得到国家的帮助，但还是‘下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就按具体情况处理。可以改变生产单位的专业性；可以把部分土地租让给较强的生产单位或合作社；可以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和有盈利的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合并；可以把土地转让给工业企业从事组织副业生产。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将不再是行政意志的表现，而是，从经济上来说，有充分根据的步骤。”

“集体农庄的新章程同以前的章程有何区别？”

“1969年召开的第三届全苏集体农庄庄员大会通过的章程同集体农庄新章程比较，可以看出，新章程不仅体现了目前苏联经济发展的趋向，而且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实施中的经济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

下面我们举几个证实以上论断的例子。

集体农庄的生产经营和财政方面的性质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在向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过渡。章程中写道——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农业单位，它在基于民主的经营原则基础上，独立自主和自治的条件下，配合国家领导。

章程规定逐渐缩小国家领导的范围，扩大生产合作社的自主性。这种集体农庄和国家相互关系的轮廓日益清晰，国家作为主要的定货者，从行政的监督方式向经济影响的方式过渡。

新的章程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了采用诸如集体、家庭和个人承包这些进步组织形式和鼓励劳动的办法，把隶属生产的土地、技术、牲畜和其它物质资源划归集体所有。根据新章程，集体农庄正式获权向庄员和其他公民，同时也向别的集体农庄、企业、组织租让土地和向他们提供为再度利用集体农庄弃之不用的场所。

属于集体农庄的房屋、设备、技术、工具、资源及其它物质财富可以租赁。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革新：除了作为国家定货并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的那一部分产品外，农庄有权自行对生产出的产品定价，其产品通过自己的销售网、市场、消费合作社和其它组织销售。

上列新办法是从法律上固定前几年实践所产生的东西。

章程还规定了集体农庄有权进入外贸市场。农庄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参与国际合作社组织的活动，同经互会成员国的农业合作社及其它企业挂钩和发展贸易经济、科技与文化联系和进行合作。同时也跟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公司保持联系和进行合作。

新章程规定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发展个体副业，把其视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当指出，这个文件较具体地制定出了民主自治的机制。”

“贵国对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是否感到满意？”

“目前，我国农业中越来越广泛地采用最新技术装备。在农场出现了电脑和遥控技术系统。在农艺中采用了激光测量仪器。在农村的修理车间可以看到利用等离子电焊机维修机械。在田间，正在进行拖拉机遥控的试验。开始为最繁重的工作之一——甜菜蔬苗，生产机器人。使用机器人，在一小时内可以完成2—3公顷种植面积的工作量。

尽管如此，农业部门中，技术革新的速度和规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因首先在于现行经济机制中存在的缺点。

这个机制，是以增加机器产量为目标，它不起刺激根本更新机器的作用（而某些农业机械的产量已超过实际的需求量）。

还在不久以前，生产者对改善机器的质量性能，使机器备有成套零件和工具，不怎么感兴趣。

至于机器的用户，他们无法以经济杠杆来影响供货者。有时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即在生产中机器的利用率不够高。因为这些机器是不顾实际需求，由上面按计划集中地供给生产单位的。在购买农机时，又处处依靠国家的补贴。

在苏联目前进行的根本经济改革，应当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它规定了生产单位向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的过渡，工作将按取决于直接挂钩和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建立科学生产联合体这一些措施。我们正是把农业技术装备中的重要改变同新经济机制连结起来这一点放在首位。”

二、民主

“苏联通过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决议。这一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如何？”

“基本方向有好几个，它们相辅相成，都一样重要，但最好还是按以下顺序排列。首先，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自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享有全部权力。其次，管理非集中化，建成法制国家，改革社会组织的活动，自然也使党内生活民主化，彻底放弃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

实际上，这是再次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如果要使这口号更充分地体现于现实，必须巩固苏维埃的立法、管理和监察职能，将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中的一切大事交归苏维埃审议和解决。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明确地分管职能的情况下才可行：各管各的。党的经济、社会、民族政策，首先应通过人民代表机构来实施。

过去形成的苏维埃选举程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所以在颇大的程度上更新了现行的选举制度。在对候选人的名额不加以限制的情况下举行了选举以及就这些候选人进行了广泛和自由的讨论，列入选票中的候选人名额多于代表当选证书。现在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组建两院制最高苏维埃并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其主席，经由大会产生。苏维埃的任期一律为5年，任职最多为两期。

管理非集中化的思想，出于必须消除管理中的多余环节和管理机构精简到最低限度而被提出的。这个管理机构必须置于人

民的监督之下。通过政权的民主化将走向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形成。这项任务的解决同最大限度地保障苏联人的权利和自由、国家与公民的相互责任感、提高法律的威望，是分不开的。它应当可靠地捍卫公民个人尊严，住房不可侵犯、通信和通话的秘密。

政治体制的改革预定对其主要环节的改革，如工会、共青团、合作社、妇联、前参战军人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些组织应当从新的角度重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巩固自己的首创精神，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它们负有建立自由对话、批评、民主监督的不间断地工作的机制的使命。在苏联，在历史形成的一党制条件下，存在这样的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党从新的角度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规定了一整套措施，旨在加深党内的民主。其中有：提高基层组织的独立性，放弃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调拨单’，辩论自由，在精简人员的同时改组机构。所有这一切，使苏共的活动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式方法上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观念。

如同苏维埃一样，将规定统一的任期：从中央到区党委，一律为5年。时间不算短，因此提出每2—3年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更换20%的党委成员。在选举这些党委成员和书记时，包括苏共中央在内，将保证对候选人进行广泛地讨论和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限制当选人员任职期，是防止干部队伍中出现停滞现象的保障。规定实施以下规则：所有党委会委员和书记，包括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内，当选同一职务的任期为两届。我们的想法是重建的统一监察机构——苏共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将是反对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的保障。同时将撤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

政治体制的改革，并非一个月能了事。它将需要通过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党的决议和采取巨大的立法行为，包括对苏联宪法、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宪法以及苏共党章进行重大修改。”

“你们说必须使党机关民主化， 加强对其活动的监督。具体指什么？”

“最近几年，曾经多次进行民主尝试，要把党的机关置于基层的监督之下，使其服从于事业利益。实行了在职人员向工作集体汇报工作的办法。但党机关却巧妙地把它变为应景的运动。也尝试过选用经挑选产生的党委会的人员。通过竞选，党机关中出现了不少能干的人。但过一段时间，就象我们常说的，开始蜕化、妄自尊大和陷于徒劳的忙乱中。

拿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来说，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类似情况。社会早就揭示出和看透了这些问题的原因：没有搞好党内反馈机制，结果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官僚集中制**。

现在将开始建立这种反馈。这里指的是精简和改组党的机关，按新的选举方法推选党机关工作人员(由基层党组织推荐候选人)。

新选举方法将提高‘双方’的相互责任感。基层组织对自己推荐的候选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在公开的环境下对候选人作全面的分析和衡量。而候选人本人也将再三考虑自己是否能胜任党工作的重担。在同意担任新工作的同时，他应当牢记，基层组织一旦发现他工作不谦虚、阿谀奉承或言行不一致，任何时候都有权免除他的职务。

一切必将体现于生活中，从党机关中逐渐清除野心家和忙于安排各种空洞措施的组织者，而取代他们的则是改革的拥护者，对后者来说，社会利益将高于一切。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所有基层组织中的气氛明显好转为前提，如果基层组织能从原则性立场出发，在推荐党员担任党机关的工作时或免除他们职务时都做到不看上级的脸色行事的话。

乍看起来，党内似乎有着明确的规定——应由选举产生的积极分子来实行‘治理’，而机关只不过是起执行者的作用。如真

是这样，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但无论我们如何争取使经选举产生的机构领导机关，想要百分之百达到此目的未必是可能的。请大家自己想一想吧。

挤奶员、医生、钳工、教师，再如州党委成员来说吧，他们总忙于自己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对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的问题进行全面、仔细的研究，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对于提出的一种或另一种问题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以前和今后仍将信赖党机关人员的内行、客观和成熟性。只有当社会实行全面的自治，党机关的意义才会降到最低限度。但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

今天，我们处于漫长的革新道路的第一阶段上。目前，党机关还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如能完成民主化过程，社会也必将向前推进。不能完成——便是改革的障碍物。”

“你们一边说扩大劳动者的权利，一边又说到国家的巩固。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

“为什么两者之间该有矛盾呢？难道有效运转的国家机器会妨碍劳动者的主动性吗？当我们说巩固国家时，我们指的恰好是提高国家机器的效益、干练程度和民主化工作进程，指的是在这一工作中把全国的和个人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自然，这一巩固并非指官僚主义的巩固。

目前，国家机制是组织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否定它的作用是荒唐的，而说到它的消亡（那怕出于善意），为时过早。

是的，共产党第一个发表声明，指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会逐渐消失，取代它的将是共产主义自治。但这必须是一个逐渐的进程。自治在国家范围内还要进行长时间的力量尝试。

必须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主义自治因素已在起作用。例如，有关直接涉及到劳动领域及其条件、报酬的问题，在颇大程度上已不属于国家管辖范围，而是由按职业性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己解决。劳动集体获得自行解决生产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劳动者向自治的过渡，将有效地刺激他们进一步发展主动性和独立性。

这样，我们对国家巩固的问题产生两种理解。一种是，为全体公民的利益，有效地和不断地提高国家机制的工作效益。另一种是，按条件的成熟性，国家机构不间断地、逐渐地将放弃其管辖的个别领域并把相应的特权转交给联合成自治组织的各阶层居民。”

“苏联准备怎样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

“实际上，今天在苏联首次采取试图‘打倒’官僚主义。至今为止，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成败，在颇大程度上将决定改革的成败。

苏联管理机构的人员约达1800万，这个数字显然过大。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顽固不化的官僚，但他们毕竟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是以一定的社会利益、心理状态和对自己在社会机制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价值的传统概念联合起来的。

苏联领导摆在全国面前的大胆任务使我们可以说，在苏联终于开始认真抓官僚主义的问题了。现在可以引出这一斗争的几个总方向，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管理系统。

居首位的，无疑是苏共现代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关心的领域中把它简要地说成是打掉官僚主义的‘生产’基地的尝试：使生产者从属于管理者，消费者从属于生产者的这种依赖状况合理地缩减到最低限度。商品紧缺现象消失后，令人反感的、寄生于必须对资源、商品和服务采取定额分配的‘经济官僚主义’，也随之会消失。

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涉及到停滞时期传统的权力分工制度。这里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把选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该选区的全部职权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把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部职能转交给相应的组织，以便使苏共能更积极地发挥其作为意识形态和精神方面的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中则解决战略性的问题，而不是那些陈旧的问题。

把管理机关精简到合理的限度，同时缩减官僚主义自我表现的范围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取消各种规章制度、膨胀的报表制度、减少下达的指令、鉴定和各种多余的‘文件’。

恢复‘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干’的原则。至今，典型的苏联官僚善于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似乎必须监督众多的、有时甚至是极为荒谬的禁令。

在同官僚作斗争的过程中，每一个单独的公民都可以发挥旨在捍卫自己和整个社会免遭官僚的曲解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可以起不小的作用。为此，制定了可靠的法律基础：1988年1月1日，关于公民有权向法院控诉公职人员的不法行为法开始生效。

无疑，公开性政策，是对官僚主义的一种主要威胁。首先是因为它侵犯了官僚主义‘最神圣的东西’——不为旁人所知的通过管理和一系列别的决议的‘秘诀’。

米·戈尔巴乔夫直率地提出大有前程的，但又难于实现的目标——克服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专家治国倾向。目前，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还无法做到。而苏联领导将准备积极利用专家的力量及其智慧潜力，来解决改革的重大任务。专家治国要付出的代价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官僚主义在文明新技术成就基础上复兴的能力，要把这种代价限于最低水平上。

如果试图简要地阐述苏联社会在克服官僚主义斗争中所面临

的任务，那么在这一具体领域中，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摧毁我国社会中官僚主义仍然赖以生存的部分结构的奠基石。”

“苏联如何评价本国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选举结果？”

“在这一次选举运动中有很多前所未有过的、不寻常的和新的事物出现。3月26日的选举日就是这样的一天——没有以往那种摆门面的隆重气氛，从表面气氛看来，象是一个平凡、安静的工作日。但是，同以前的选举日相比，这一天更充满了焦急不安和内心激动的心情。有关选举结果的最初消息也是如此。虽然大家对这些消息几乎有一定的把握，不过，还是对它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以及出乎意外的证实了在我国社会生活、千百万人意识中的变化。

选举进行得怎样？谁当选为区代表和共和国代表？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是否揭晓？熟人和甚至素不相识的人在见面时都互相询问。人们迫不急待地等候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报道。可以说这就是这次选举运动的第一个和极重要的结果——克服了漠不关心和消极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激发了千百万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确立了我国公民的自我意识。

选举结果如下。按昨天的标准和观念，一些自然而然该得到人民托付领导权的人落选了，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远没有达到获得人民尊重他们的要求。相反，一些机关代表公开称之人民不需要的人，在选举的这一天却得到普遍的支持。

类似的实例很多，下面我们只谈二个。第一个人是鲍·叶利钦。党委极不乐意让他当选为代表，因为党机关对他不怀好感，但叶利钦受到人们的大力支持。另一个例子，参加伏尔加格勒民族地区竞选的著名作家尤·邦达列夫和昨天还很少为人所知的青年领袖亚·基希廖夫。选民投了基希廖夫的票。

自然，输了总是不愉快的。再说，几十年以来，象选举这样的斗争场所是没有过的。

到选举那一天，全国几乎三分之一的选举区只有一个候选人。看来，组织选举的人习惯认为，候选人不经过竞选这一场斗争保留代表委任状，更可靠一些。但今天的社会大不同于昨天的社会。很多地方的选民把这种作法视为是向正在确立的民主的挑战。这引起人们的愤怒，他们说，这象什么？又有人企图不让我们举行选举。我们不准许这样做。

一系列选区的选民确实没准许他们这样做。那里又重新举行了选举。第二次选举。这样对今后的选举作出了重要结论：往后要得到社会的信任，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证实你确实可信任，要以会善于斗争和公开地进行斗争来证实自己可行，提出能使国家摆脱所处的困难境地的新的和坚决的措施。仅是职务，尽管很高，就象高谈阔论一样，今天已不够了。

这次选举运动及其结果的意义在于，它给予了社会千百万具有政治积极性的公民，他们相信自己能影响国家大事这一现实。在选举未来的代表时，人们将他的纲领计划同自己对国家活动的概念作比较。确定自己的立场，自己对公开性、民主、改革的态度。这就是改革获得的又一个政治成果，它是恢复苏维埃无限权力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您就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能说些什么？”

“在结束国家内外政策和政府纲领辩论时，著名演员及导演、人代会代表罗·贝柯夫称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为世无伦比的电视大汇演，其意义尚未完全认识清楚。看来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评价。数百万苏联人一连几小时目不转睛地观看电视。但就这

次大会的实质而言，我们不能接受以上的评价。一般，在表演前需做长时间和精心的准备、排练，使之日益精湛，其一举一动都经过周密考虑。我们是否能用上述尺度来衡量这次莫斯科大会呢？当然不能。不同于事先作好安排的显著之处，正在于大多数与会者在这次大会上初次相识，在大会进程中不仅对自己，而且对那些有时争先恐后的同行也是逐步了解的，与会者向大会倾吐选民摆出的许多尖锐问题。全国，犹如照镜子似的，通过自己的当选人审视自己和自己的问题，对近五年内它托付主宰其命运的人们的治国才智作一一对比。

当然，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和意义只有时间和今后的实际工作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对大会的成果，在选民和代表中都不会有同一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代表对大会寄予了过大的希望。另一些代表对于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和不是所有建议都被通过而感到不满。

这次大会最宝贵的一点，可能在于它再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状态、弱点和成了国家生活中的一件不寻常的事。

这确实如此，大会以新的国家政权民主机构、各种小组和委员会的建立、自己的公开性和意见的多元化为解决政治改革第二阶段上众多问题奠定了开端，而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把权力名符其实地转交给苏维埃。这次大会的优越性还在于它在重要的生活领域里——政治、在解决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独立自主和其它方面指出了发展方向。”

“苏联工会在改革条件下起什么作用？”

“正象由最大的社会公众组织——工会，在最近一次第18届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工会应当在经济决议通过时加强这些决议的社会方向。当然，以前也同样进行过这方面的工作。例如，

在工会的直接参与下，国内实现了一系列完善劳动报酬的制度，改善了劳动居民生活和休息条件的措施。尽管如此，工会对最近几十年来在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消极过程负有责任，经济中的社会倾向显然降低了。

目前，情况有所改变。苏联制定的截至2000年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纲领正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它规定了增加一倍物资，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在制定这一纲领的过程中，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支持并考虑到了工会提出的所有建议。这些建议关系到加强物质刺激，以最终劳动成果为目标，增加最低期限的休假日，完善社会保障事业，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

尽管如此，苏联工会将要经受一场成熟性和生命力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出现了同它‘竞争’的社会组织的条件下。因为这些‘竞争’组织的出现，是对由于工会在表达劳动者利益方面表现消极的一种反应。”

“你们认为‘劳动集体自治’意味着什么？”

“在苏联进行的根本经济改革，规定企业（组织）向经济核算、自筹资金和自治过渡。

企业将得到自主性和承担责任。企业只靠自己‘挣得’的钱生存。这就是说，劳动报酬的支付也将更加灵活。自然，劳动者对企业经营活动，对由谁来领导，怎样领导，对企业作出一些决定的关心程度也就日益增大。

当然，自治不是在空地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它也以各种形式存在过，但当时集体作出的决定只不过带有建议性质而已。

新企业法保障了自治的合法性并赋予它新的职能。首先，在每个企业里建起选举委员会。其中有工人、工程师、行政代表

(后者不超过组成的1/4)。委员会任期2—3年。以后的每次选举将更新成员(最少1/3)。被选入委员会的工人,不经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受处罚或被解雇。

属于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有解决诸如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的分配,设备的现代化,奖励工作人员,改革企业和管理的结构,以及培养干部等一些重要问题。劳动集体和行政领导必须服从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但如果委员会同领导的立场不一致,那么就召开全体大会作出最后决定。

我们在上面已谈到过,采取的一项极重要的新措施,就是经选举产生的企业领导人。例如,以往厂长是由上级机关指派的,而现在工人自己选举领导人,并以差额选举方式对几个候选人逐个进行讨论。厂长任期至下届选举为止(就是说不超过5年),在下届选举时,他又可能当选,但也可能被提前免除职务。当然,有时也会发生另一种情况,大多数人投票赞成错误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有可能通过同样的民主方法纠正错误。”

“每个苏联工人持有劳动手册。 这是什么东西?”

“这种劳动手册不仅工人有,所有在国家、合作社、社会组织、机关、企业或工厂工作的苏联人都有。劳动手册是记载一个劳动者劳动经历的证件,因此,需要它的首先是劳动者本人。为了捍卫会员的利益,工会组织监督着这些手册记录的正确性,并非偶然。

手册的重要性在于使国家社会保障系统能正常工作。苏联人不向社会保障基金交纳任何费用,但病假期间,按手册中记载的工龄,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不管这个人自始至终是在一个单位里工作,还是换过别的工作单位。比如说,在手册中记载着某人连续工龄为8年,那么在其暂时失去劳动能力时,将领取100%的工资。

如果一个人有了必要的工龄，他有权领取全额退休金。年满60岁的男子，工龄应为25年，年满55岁的妇女，工龄应为20年。这个规定只关系到一些基本的普通工种的劳动者。对另一些工种，工龄期限则要短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手册主要是为领取养老金时证实一个人工龄长短的必不可少的文件。根据手册中记载的个人对社会和国家作出的功绩，解决他领取较高的养老金的问题。我们就拿令人悲伤的一件事作例子吧：一个人死了。死者的劳动手册将交给其家属，手册将是因失去供养人而领取抚恤金的主要文件。

一个人搬了家或迁往别的城市。在新的地方他要找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又会做些什么呢？其技能程度如何？当手册的主人把手册交给行政人员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记载在手册中。例如，行政不能无缘无故地把一个人调到技能程度低的工作位置上。任何一个法院或劳动仲裁机构在审核工作人员劳动手册中所记载的有关技术级别后，必使该单位行政恢复该工作人员的原职，或向该工作人员提供他愿意接受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劳动手册中除了记载出生日期、文化程度、职业、熟练程度和提升之外，还有哪些记载？除此还记载有关工作人员的功绩、表扬、在劳动中作出个人成就被授予的奖金、发明创造以及为此获得的报酬金额、授予的光荣称号、奖状和国家奖赏。但是，劳动手册中不作记过的记载，因为，实际上，谁都不能担保他不会犯错误。”

**“贵国的生活中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否也涉及到文艺领域？”**

“我国开始的改革涉及到苏联社会中的所有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学和艺术。文艺创造中的改革目的，是为出版有趣的书籍、电影、戏剧、作品创造最佳条件。这是人们所必须的，有助于充

实人们的生活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它。同时，将阻止那些空洞无物的平庸作品的出版。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过去苏联艺术中提出的是另一种目的和任务吗？说到目标，当然还是一个，但在走向这一目标的途中，常常走向歧途。文艺工作者努力表现严酷的生活真实，提出尖锐的问题、揭发痛处。但这引起惯于过安逸生活的官僚和谨小慎微的人不安。同反面现象作的斗争没停止过，但这一斗争远远不够坚决。从前也有过在平庸作品前筑起防线的尝试，但这道防线未能经受住它们的猛攻。

今天的情况有所改变。

文艺中的变化非常明显。还在不久前，无论是对个别人物，还是对现实的歌功颂德和大唱赞歌的体裁，是十分流行的，现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始出版并继续在出版昨天还被封禁的书籍。过去，读者埋怨刊物中的文章千篇一律。今天有那么多有趣的作品，读者又埋怨说来不及看。

比如，《各族人民友谊》杂志刊登了沙拉莫夫的《科雷姆笔记》，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涅瓦》杂志刊登了杜金采夫的《白大褂》，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新世界》杂志刊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旗帜》杂志刊登了扎米亚金的《我们》。文化史的空白点开始消失。这也是改革的不可逆转的证明。

电影也以全新的影片出现于影坛。给人印象最深的影片之一是《悔悟》。它的实质和激情同社会坚决转向民主化这一点相吻合。《切尔诺贝利的警钟》和《当一个年轻人容易吗？》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戏剧也获得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安排自己剧目的广泛权利。摆脱了‘琐碎的包办代替的做法’。创作主动性日益具有必要的广阔天地和动力。新的戏剧团体在产生。其中的一些剧团立即博得观众的欢迎。

戏剧界人士对莫斯科‘板上’实验剧团准备排一出(或几出)不仅以中国题材为基础,而且还采用中国戏剧传统手法的戏,感到莫大的兴趣。”

“苏联文化生活中目前的变化是否来自‘上面’的改革?”

“不,不是的。原因如下:早在象‘改革’、‘公开性’这些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常用词以前,苏联的先进创作知识分子就显示了自己的社会成熟性,显示了对停滞、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的反感。我们已说过,今天在电影院上映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大胆影片,刊物上发表的中、长篇小说,并非一天,也并非一年之内创作的。其中一些作品长期被搁在作家的抽屉里或制片厂的书架上,但其中个别作品还是突破了设置在其面前的各种障碍,同观众、读者,同人民见面。这些作品倾述了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并指出是什么在妨碍社会向前推进。例如,亚·特瓦尔多夫斯基、钦·艾特玛托夫、瓦·贝科夫、尤·特里丰诺夫的作品,就属上述之类的作品。

但谁也不隐瞒,改革是由党、党的中央委员会指导的。但我们说的改革,是在人民的提示下产生的改革。著名的苏联演员米·乌里扬诺夫对出现的局面作了一个极好的评价。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对生活产生了两种明显的看法。一种看法,也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看法,那就是,我们不能退却,再说,也无退却的余地。这是革命的态度,也是今天唯一正确的态度。另一种人认为,何苦呢?何必要‘找麻烦’,这样生活下去不是挺好吗。我深信,分水岭就在于此。我们要么干到底,要么把改革推到一边,半途而废,这样我们又将陷于死泥潭。”

看来,问题不在于来自‘上面的改革’,也不在于一种暂时

采取的政治行动，问题在于以发展列宁准则为基础的，改革生活的战略路线。先进的、革命的同教条的、保守的两种倾向相撞。前者对在我们社会中的所有领域实现质的变化表示拥护；后者则畏首畏尾，不想有变化。

进步的创作知识分子同大多数人民一样积极拥护第一种倾向。他们感到改革对他们有利，改革将为他们新的创造可能性开辟新的前景。”

“在苏联将如何讲授苏联国家史？”

“问题本身就包含答案：‘不同于过去’。但这个‘不同’又意味着什么呢？

历史教学将有变化，而且已经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变化是朝哪些方向进行的呢？

首先，这是扩大叙述事实的篇幅和文献材料，放弃‘对某些人物保持缄默’的态度，即，对在历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和事件不能作单一的评价。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人物，同时，如果这些人犯了错误，也研究这些错误。

还有，必须指出，这是放弃粉饰，放弃简单化地对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做法。旧的教科书忽视某些历史事件及其参与者，其原因不仅因为被禁止或建议不要提及（有过这种情况），还因为这些教科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战无不胜的发展’的观念。现代的教科书应当反映发展的真相——既有胜利，也有困难，又有错误。

无疑，对某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活动也要作出新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按新的‘公式’作出（根本就不该存在这种公式），而是根据密藏于档案中，不为众人和历史学家所知的事实、文献、历史证件来评价。

在新教科书、讲义、历史专著中将包含各种解释、评价、观点，总之，作为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所需要的一切。顺便说一句，

这将会使人们把历史看作一门活生生的，发展着的科学，有助于热爱历史。

放弃用今天的理解尺度来衡量和评判历史人物的活动的作法也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常批判以往政治活动家的过错，因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明显地看见这些过错的后果，但在当时，却是难以预测的。此外，我们还要摆脱处处在过错中看到恶意破坏的做法。实际上，这些过错很可能是由于真诚的失误、措手不及、对政治形势的一种错误分析引起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不仅在科学分析领域中，而且在包括学校在内的广大读者所使用的历史材料的广度问题。课本归课本，除此还有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有第一手资料，还有不同专家对同一事件和同一人物作出的各种评价。用新方法讲授历史，其重点在于在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之外去寻找知识，这些教科书只能在书籍、文献和观点的海洋中指出方向，起指南针的作用。”

“苏联出版刊物是否有限制？”

“有的。 在我们的报纸上和刊物中禁止宣传战争、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侮辱宗教信仰者的感情、刊登色情照片、宣扬暴力或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禁止刊登未经核对和不符合真情实况的资料。

我们认为这些限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这不仅不贬低，反而强调了出版事业在苏联社会中起的重要作用。”

“苏联有多少报纸和杂志？其中哪一些出版量最大？”

“苏联目前有8000多种报纸和5000多种杂志和各种其它期刊。报纸的一次发行量达两亿余份，而年发行量达500多亿份，杂志和其它各种刊物的年发行量约达40亿册。

1986—1987年，中央报纸和杂志的订阅者比以前增加了1400多万户，这一现象是直接与国内进行的改革有关。国内的更新过程，一方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的促进下，报界也就更大胆、更深刻地揭示存在的问题，扩大了涉及的领域，从而发扬了公开性并加强了对昨天还习以为常的一些现象的批判眼光。

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工会的《劳动报》，近2000万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达900多万份。苏联青年报纸《共青团真理报》——1700多万份。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行的《消息报》——1000万份，而为学龄儿童出版的《少年先锋报》——900万份。

杂志的发行量也极为可观。苏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发行量达100多万册。文艺和社会政治月刊《新世界》杂志——100多万册。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周刊《星火》——300多万册。文艺和社会政治刊物《青春》月刊受到不同年龄人们的普遍欢迎，其发行量为300多万册。全苏知识协会出版的科普刊物《科学与生活》月刊——320万册。供妇女阅读的《女工》月刊——2000万册。以上提到的是众多刊物名册中的几种。

顺便指出，在‘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各分局——在苏联境内发行报纸和定期刊物的发行处——可以预订社会主义国家的刊物，一些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出版的报纸和杂志。”

“听说苏联纸张紧缺，这是否影响儿童书籍的出版？”

“是的，纸张确实很紧缺，因此目前还不能全部满足对儿童书籍的需求。我们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制定了加速出版儿童和青少年书籍的7年计划。其主要目的——满足少年读者对书籍的需求，使少年能读到他们易懂的几乎所有国内外的最佳作品。

7年计划包括了200多部俄罗斯、苏联和外国经典作品、现代文艺、革命历史、科普书籍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神话故事。被列入计划中的书籍，其发行总量将达20—70万册。属于‘宝库’的20多部作品，将超量发行——150万至300万册。每个儿童都可以得到《儿童百科全书》，有关电脑和无线电电子学、有关自然与动物的书籍、交通安全规则及许多其它可提供知识的书籍。我国66个出版社，不管其出版何种性质的书和属那个主管部门管辖，一律积极地投入完成这一项计划。到1995年，苏联儿童书籍出版量将近10亿册。”

“贵国电视观众最喜欢哪些节目？”

“我们只提几个节目作为例子。‘改革：问题与解决办法’就属深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参加节目的有各部和主管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卫生、财政、轻工业等等）。他们通过播音室里的直通电话当场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请相信，这些部和主管部门的代表在回答来自全国各地观众提出的大量的公正指责时，滋味常常不是好受的。结果，由于这一节目，揭示出了各机关工作中的缺点，现在正在克服。有时也作出组织处理。在这个节目播放时受到批评的某些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被迫辞职。

每晚在“时代”新闻节目之后，列宁格勒台还播送“600秒”节目，这个节目每周六次。在这十分钟内，节目主持人向人数相当多的观众（全国有许多其他地区的居民收看这一节目）介绍内容十分尖锐的谈话，所谈的都是需要刻不容缓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对其他城市来说也是很典型的。

莫斯科的电视节目‘莫斯科，晚上好！’引起广大居民极大的兴趣并且都希望直接参加解决的问题。莫斯科33个区的居民会会见自己的区领导并通过播音室的直通电话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住房分配、街道公用事业、商品供应、区医疗诊所的工作情

况等问题。区领导当场解答居民提出的问题或邀请他们到区苏维埃执委会就提出的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早晚间播放的新闻音乐节目也深受观众的欢迎。节目中包括同有趣人物的会见、辩论、对国际事件的评述、音乐前奏、解答观众的提问。

这些节目不久前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

我们的传统节目有：‘时代’、‘国际事态’、‘旅游者俱乐部’、‘乡村’、‘健康’节目。这些节目的内容时常是由观众自己提示的。

青年节目也很受欢迎。目前它们显得更活跃、问题提得更尖锐、更坦率。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观点’节目。电视答题游戏节目‘什么事？在哪里？什么时候？’也极受欢迎。

我们的小观众也有心爱的节目‘晚安，小宝宝！’”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电影的观看人数显著下跌，贵国是否有这个现象？”

“还在70年代末，苏联人看电影的平均统计资料表明：每人每年观看20场电影。今天为14场。按专家预测，截止2000年，观看电影人数的指数将为8。可见，在我国也有这个倾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社会学研究表明：观看电影的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强加于人的内容，人们不愿看。我们显然拍摄了过多的‘生产题材’，在军事和惊险题材方面大量重复陈旧的情节。崇高的思想贬值了，观众常常离开电影院……

一些电影工作者断言说，体裁本身会‘引上歧途’。例如，《我来了就说》这部影片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它就是以罕见的音乐传奇剧的体裁拍摄的。这部影片的主角是深受欢迎的轻音乐女歌手普加乔娃。观看这部影片的人数达2500万。但考虑到普加乔娃享有盛名，也可以拍制一部观众达7000万的影片。由于剧本、导演艺术和演唱者本身都没表现出最高水平，因此观众也就不那么热乎。

戏剧性不在于有不成功的，或象我们常说的‘灰色’影片。艺术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指责。说也离奇，影片发行的戏剧性在于这些影片竟然搬上了银幕。有时甚至达到这种地步：毫无根据地大量复制影片的费用要比拍制这部影片的费用大，其结果是得不偿失。

还在不久以前，不考虑地方电影发行机构的愿望。这里可能是由于过分倾向娱乐性和商业性的影片。但现在有可能逃脱这一关。例如，电影发行人员为‘难度’大的影片，即非传统性内容题材、复杂的表现手法等的影片规定了较高的奖励。我们需要严肃的艺术作品，同样也需要特别受欢迎的影片和娱乐性的影片。这无论是对国外的电影还是对国内的电影来说，都是一样。

目前电影发行机构正在改革中：向全面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过渡。影片发行工作将要下放和区别对待。我们深信，这将有助于各种不同的观众看到各种不同的影片。

今天，在电影发行机构工作的有20多万人。他们当中有献身于电影事业的人，积极分子，但也有偶而来到这一行业中的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专门培养电影发行工作人员。我们对职业性的电影发行工作人员的需求不次于对杰出导演的需求。我们需要专业的影片发行人员、影片发行的经理人员。他们善于正确理解影片并把影片送到需要的对象手里。按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和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的建议，不久在电影和艺术学院将附设电影发行工作者系。

可能毕业于这一系的专业人员会阻止电影观看人次的下跌。很多人觉得这个过程是自发的和不可控制的。”

“苏联报刊经常报道有关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和其它违法行为。原因何在？”

“哪里违反了按政治、业务、道德素质进行选择 and 安排领导干部的列宁主义原则，哪里失去了对各领导人活动应有的监督，无

论是上级领导机构，还是党组织和劳动集体，哪里缺乏公开性和无视社会舆论，那里就出现这种不良现象。

今天，党制定出加速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方针，现实地和批判性地评估了目前的情况，从而采取了从党、国家和经济机构中清除出败坏了自己声誉的工作人员的根本措施。这些措施达到了广泛地公开化。

为了防止今后再度出现这种现象，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任务是：提高领导人的责任，加强群众对其活动的监督，深化党的民主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广公开性。

我们对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工作马虎不负责、玩忽职守、唯利是图、徇私情、任人唯亲，这种行为应当制止并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置于批评之外。”

“在苏联向法院起诉有哪些规定？收费多少？”

“每个公民都有起诉的权利。申请书是以书面方式提交法院的。申诉人必须在申请书中说明争议的原因并以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实他提出要求的必要性。如果争议可用钱款来估价，则指出受损的数额。申诉人在起诉时，法院对其申请书课以国家税。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补偿国家用于法院的费用，而且也促使申诉人如无确凿根据不要乱起诉。

国家课以的税金金额和其计算程序由法律规定。税金金额不算多。例如，索赔价值不多于20卢布，征税30戈比，20—50卢布，征税50戈比；索赔价值50至500卢布，征税2%；超过500卢布，征收索赔价值的6%。

当职工要求赔偿工资、因被解雇和其它涉及劳动法的要求时，国家免去向他们课税和交纳诉讼费。同样，集体农庄庄员向集体

农庄索赔劳动报酬和提出其它牵涉到劳动的要求时，他们享受免税。对要求索取赡养费，因造成残废要求赔偿，有关丧失供养者的诉讼，国家免去向他们课税。

法院在审理民事案时，有权根据公民的经济状况免除他们应交纳的税金。”

“苏联法院采取哪些惩罚措施？”

“我们基于列宁的原理，即惩罚本身的实质不在于其残酷性，而是出于其必然性。因此，我国的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是相当人道的。它弃绝无期徒刑，而有期徒刑的最长期限为15年。

对那些犯下严重罪行（企图谋害人命、伤害公民健康、累犯者、作恶成性的盗窃者、贪污受贿者）的人，我们则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在苏联，如同其它127个国家一样，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施以极刑。

苏联司法的特征是，减少用剥夺自由的形式来惩罚罪犯。在可取代惩罚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以劳动改选或罚款来代之。十分重视社会影响手段，其中包括开同志审判会。

最近，广泛运用将作出的判决缓期二年执行的作法，这一措施是针对初次犯罪的人采取的。但同时责成犯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果罪犯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法院有权将他解送监狱服刑。”

“苏联准备改革刑事法典，原因何在？”

“旧刑事法典条款过多，它们都是在70—80年代接二连三地被列于法典中的。其原因是，因为没有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途径来消除不良现象，因此只得把希望寄托于禁令之上。

由于这些积沉，刑事法典显得过于臃肿。至少要取消其中两组条款。第一，取消那些无用和无效，从而时常又无法实施的条款。第二，取消那些可以用行政和纪律处分来代之的条款。

根据上述这一切，我们开始制定新的刑事法典。”

“苏联是怎样拟定新法律的？”

“拟定新法律，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因此，对还属草案中的法律条款，不止一次地反复进行检验。为了解释这一点，不妨回顾一下住房基本法制订的经过。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政府制订草案。继之，委托苏联司法部、一系列其它中央部门和主管部门、检察院和苏联最高法院、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制订草案；要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科学院提出自己的建议。研究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公民的来信和各种房屋争议的解决结果，同时也吸取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

庞大的机制转动了起来。关于未来法律中每一条款的通信可以编成好几部书。

在住房基本法草案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前一年，中央和共和国报刊公布草案供全民讨论。讨论过程很活跃，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富有建设性。

由此可见，这项立法工作的路途是漫长的。当然，大家懂得，住房问题并没因此而解决，但在当今的条件下这是最合理的一种调节办法。但是法律规定的条款不能预见到整个生活的多样性，有些东西不得不接受，对有些东西则加以修改。我们现在不是来评估住房法，而是讲述它是怎样产生的。

森林、河流、土地基本法、婚姻与家庭法、保健、国民教育法、历史文物古迹保护法和一系列其它国家法，都是按上述程序制定的。”

“贵国有外国法律委员会，它有哪些职权？”

“外国法律委员会是苏联律师的专门联合组织，它向苏联公民和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员和组织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联合组织同许多外国司法公司、法学家和律师保持业务上的联系。这项合作是建立在经常性的和长期协定基础上的。

外国法律委员会接受顾客要求办理的各种性质的委托：继承、索取私人财产、保险金和赔偿费、银行存款，同婚姻一家庭有关的事项。

该机构办理苏联公民在国外的事务和外国公民在苏联境内的事务。

除此之外，外国法律委员会在我国代表外国公司、保险公司和其它组织在外贸和签署海运、铁路运输、空运协议的利益。

外国法律委员会保障自己的顾客充分利用苏联和外国立法以及国际协议和协定所规定的权利。”

“苏联对战犯的立场如何？”

“根据苏联法律，战时犯下的罪行是没有时效期限的。

1942年10月14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强调指出，苏联指望有关各国互相协助，寻找战犯并把在占领区犯下组织或参与犯罪行为的希特勒分子及其同伙引渡有关国家并转交法庭严办。

这一要求记载在国际法律中。

苏维埃国家对所有关系到惩罚战犯及其同伙的问题履行着自己的义务，还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争结束初期，苏联有关部门按罪行的轻重逮捕和判处了很大一批纳粹战犯。哈尔科夫、斯

摩棱斯克、克拉斯诺达尔、斯塔夫罗波尔、布良斯克及其它许多城市开庭审判战犯。这些公开审判过程和法庭的判决在报刊上和其它大众信息手段中都详细报道过。

苏联有关部门查明了在美国、西德、加拿大、英国等国避难的几百名希特勒分子及其帮凶。苏联要求把这些战犯引渡给苏联，但并非所有国家的当局愿意这样做。”

“苏联限制本国公民出国是真的吗？”

“苏联法律一向规定了公民出国定居的可能性，如同家人团聚、结婚，以及其它有份量的原因。

为了使规章更明确，1986年，苏联出境和入境规定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明确地和详尽地阐述了哪种情况将可能是造成拒绝批准出国的原因。

根据上述规定的第25条，苏联公民在掌握国家机密的情况下，禁止以私人身份出国；那些对国家没有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人和因犯罪受法律制裁的人等，都禁止出国。当然，所有这一切只在一定的时效内起作用。

有关公民是否掌握国家机密，因此也就关系到他是否能出国的鉴定，由申请出国公民的工作单位、主管部门、企业、机关作出。

如果某人出国将侵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人同样不能获准出国。例如，某人出国而其子女留住苏联，他应当履行自己对子女负有的所有财产义务，包括交付全部抚养费。14岁至18岁的孩子出国，必得有他们的书面同意才能获准。申请出国的手续一般为一个月。如需要作补充调查，期限则延长，但不超过6个月。

最近，苏联驻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接到上千份要求回国的申请书。经有关单位审理后，大部分人的要求得到满足。”

“苏联人是否能同外国公民结婚？”

“除了一般公认的禁例外，苏联‘婚姻与家庭法’允许苏联公民同外国公民结婚。

最近几年来，这类婚姻已达上千起。这些国际家庭自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定居点。一些人留在苏联生活，另一些人跟随对方定居在世界各国。”

“在苏联是否可以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

“看来，这里指的不是收听一般的外国电台的广播节目，也就是说，不是指伦敦电台的英语节目，巴黎电台的法语节目，而是指专对苏联广播的节目吧。

我们不禁止收听上述任何广播节目。

我们把广播交往视为是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手段之一。”

“苏联国际旅行社为自己的客人提供哪些旅游线路？”

“国际旅行社提供各种各样的旅游线路。这些线路经过苏联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150个旅游中心向外国旅游者提供服务。

愉快的旅行可以同疗养相结合。例如，在闻名的黑海疗养地（索契、巴统、苏呼米、敖德萨、雅尔塔），北高加索的疗养院和休养所（皮亚季戈尔斯克、叶先图基、热列兹诺沃德斯克、基斯洛沃茨克），沿厄尔布鲁士山脉或芬兰湾沿岸边休息边进行治疗。”

“哪一些人和怎样才能到苏联留学？”

“报考苏联院校的优先权属于劳动阶层出身的男女青年——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不管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职业的种类和性质。自然，报考者应当有相应的文化水平。

想在苏联求学的外国公民，该向本国统管这些问题的国家部门或其它机构提出申请。

苏联社会组织（工会、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苏联对外友好与文化协会联合会、苏联妇女委员会、‘祖国’协会等）每年向国外相应的社会组织提供奖学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公民应当向该组织之一申请要求在苏留学期间的奖学金。至于报考卢蒙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那么该大学按照本校的章程招收学员。

苏联培养外国专家是在无偿的基础上进行的。”

“苏联青年公民可以在西方休假吗？”

“每年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约有40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18岁到30岁的青年人。

30年前，为组织青年人的国际旅游成立了专门的‘卫星’旅行社。今天，该社同世界上80个国家的500个旅行社保持着业务联系。

‘卫星’旅行社向青年旅游者提供优惠待遇。比如，每年近3万名青年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大学生免费出国旅游。对其余想到西方国家旅游的人，只以旅游券一半的价格收费，对去亚、非、拉美国家旅游的人，只以旅游券1/4的价格收费。

尽管如此，到西方国家旅游的旅游券不是所有的人都买得起。请看这个比较：由于价格上的差别，到苏联来旅游的西欧青年所花费的钱款只是到西方旅游的苏联人所花费的钱款的1/5—1/3。

因此，对大部分苏联青年来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去旅游比起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旅游要便宜的多。”

**“苏联大学生在假期被迫到建筑工队
劳动是真的吗？”**

“自愿是组织大学生建筑工队的基本原则。有些大学生建筑工队还要通过选聘才能被接受，因为每一个名额有10—15人报名。是什么吸引着大学生在建筑工队度过自己的暑假呢？

首先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独立解决问题，到自己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往返的路费由邀请单位支付），结识新的朋友。工资高，也是大学生踊跃加入建筑工队的原因之一。建筑工队队员在1—1.5月内的收入可达500—1000卢布。

例如，1987年到建筑工队工作的大学生达80万人（其中8500人来自10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他们建筑了大约19000个工程项目，价值达17亿卢布。”

“什么是非正式青年组织？你们是如何对待它们的？”

“在70—80年代交替时期，我们惊奇地发现‘罗克’、‘嬉皮士’、‘潘克’、‘霹雳士’、‘金属派’，不仅存在于西方，我国也有。在我国称之为非正式青年组织，一组组青年按各自的志趣、爱好，分组聚合共同度过闲暇时间，仅属于一种相互交往的形式。例如，‘罗克’——‘夜间竞速者’，喜欢摩托车、快速行驶，喜欢这种挺险游戏；‘金属派’——陶醉于‘重金属’音乐流派之中；

‘霹雳士’——跳着复杂的霹雳舞。一般说来，每个组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支持者，自己的衣着、举动的派式。例如，一些人身穿皮夹克，手带长筒手套，面带遮去半脸的挡风镜或者带金属手镯和带刺的项圈，还有带狭窄的黑眼镜和耀眼的额巾等等。

这些小团体的名称及其成员的外貌往往是仿效西方同龄者的模样。但是，必须说清楚，他们并非全部照搬西方。因此，如果只作一般地直接比较的话，那是不对的，不能象评价国外相似的现象来评价他们。

但是我国为什么还是出现了这种非正式组织呢？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它们出现的是那些教育者。今天，他们在埋怨一些青年举止不重，对任何假象反应特别敏感的小青年，时常遇到成年人的形式主义和教条态度——口是心非。这一‘原则’实际上被他们移植于青年组织——共青团中。对许多男女青年来说，参加共青团的工作成了一种必须履行的，枯燥的仪式：他们讲话‘看风使舵’，同时却保留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愿望。当然，不能把青年非正式组织看作是直接取代共青团的产物，但这些组织是对共青团发出的一种信号：共青团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

围绕青年非正式组织的争论经久不息，越争越烈。问题不在于外貌古怪的年轻人使老一辈感到难堪。对一些比较沉着和明智的前辈来说，他们对这些青年问题作出了准确的评价：‘让青年随意打扮。他们自然应当有同我们不一样的审美观。再说，也要考虑到青年超越芸芸众生的心理。哪怕只是在外貌上也好。’

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青年在这些集团中举止的性质和动因，他们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青年非正式组织有着多种多样的形象，所以也就很难给予明确的评价，即‘是好还是坏’。

这些组织包含一切：有的表现出社会的积极性，有的追求脱离周围世界、脱离周围世界的问题；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也有破坏社会治安的流氓行径，残酷，对周围的一切表示不满。但在这

些青年非正式组织中，例如，也有保护周围环境的团体或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团体。他们以社会之忧而忧。有些团体则以对东方，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兴趣联合起来的。但是在一些团体中也有‘狂热者’，他们在体育场打架、捣乱，那些‘罗克’在公路上制造车祸，而‘嬉皮士’则借助于麻醉剂‘寻找脱离现实之路’。来自莫斯科近郊柳别尔齐的一些好斗的‘柳别尔齐人’以‘净化’首都为自己的目标。他们认为，该把嬉皮士、金属派、霹雳士之类的‘水锈’、‘污垢’清除出莫斯科。

许多青年团体有走上极端的危险。应当怎样来引导它们只做好事和善事？

有一点是极为明显的：凡是同青年非正式组织有关的问题，无论是教训还是严厉的管制，都无济于事。但我们必须帮助青年区别真与假，识别事物的表面现象。”

**“你们说，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
但最近贵国发生的事件，说明不是那么
一回事。就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

“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复杂情况，正是由于我们在某一阶段上认为民族问题已得到解决。但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某些共和国、区域积累了不少问题，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以至发展到畸形状态。我国一些地区的纠纷发展到企图引起人民和民族之间相互疏远的地步。

今天，我们从自己在以往年代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当时，正当为争取作一个新人，争取其思想道德教育而奋斗时，往往只以敷衍了事，举行盛大游行和友好仪式而告终。

经济发展中的停滞状态，已积累的社会问题，也影响了民族关系。

我们自己也承认，拖延、缄默、回避解决尖锐问题，不会带来好结果。我们不否定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现在勇敢地、坦率地谈论我们未解决的和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懂得，只有在改革的进程中才能从整体上解决尖锐复杂的人民发展问题和民族间的关系。”

“贵国信教的人数是否在增多？”

“苏联没有按信仰统计居民的数字。在护照上和其它正式文件中也没有信仰一栏。但根据社会调查，我国成人中间70—80%是无神论者。信教者只占成人中的五分之一，而那些积极参与宗教仪式活动的人在懂事的人中间不超过10%。自然，在我国各区和各社会阶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男子和妇女，青年和老人中的信仰程度各异。有些教会确实有能力使教团人数保持稳定，在某些阶层中提高对宗教的兴趣。如果认为，宗教组织中的人尽是些老年人和文盲，那是不对的。在一系列组织中，首先是教派中，制止了教会老化和雌化。

但总的来说，苏联社会中的世俗化过程在加强；在每新一代人中信仰宗教的人要比前一代少。这一事实证实了马克思的想法：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宗教也就随之消失。”

“贵国是否允许出版和发行宗教刊物？”

“允许的。几乎所有较大的教会，都拥有自己专门的出版部门和发行机构。例如，俄罗斯东正教出版《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杂志》并附有用外文出版的简明杂志。这些杂志阐述苏联

各地的教会生活，刊登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各等级神职人员、一般教徒的发言，登载有关国外基督教会生活和活动的述评。

除此之外，俄罗斯东正教的出版部门经常大量地出版圣经、福音书、诗篇、教历、祷告书。一些其它基督教会和教派也同样利用这些书籍。

同样，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经常出版可兰经和其它伊斯兰圣经。

属苏联犹太教中心的莫斯科圣咏教堂经常出版教历、祷告书。仅在近5年内，《五经》就出版了好几次。”

“贵国是否有培养神职人员的系统？”

“考虑到教会需要培养为宗教服务的神职人员，国家允许其中心组织创办教会学校。教学过程的组织工作及其内部规则，是宗教组织自己安排的。目前这所学校有18所，其中包括6所东正教神学院和教会学校，2所天主教教会学校，伊斯兰教大学和宗教学校，犹太教学校，基督教—洗礼教派福音讲习班等。教学分在校和函授两种形式进行。

俄罗斯东正教在最近二十年来培养了上千名神学副博士、硕士、博士。

自1971年起，莫斯科宗主教教会学校成了世界东正教青年组织兄弟同盟会的成员。而自1975年起，俄罗斯东正教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教会学校参加了欧洲青年普世教会运动协会。

东正教教会学校学员以安提奥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教会神学来提高自己的教士水平。在列宁格勒的神学院中设有亚非系，这些系培养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印度和其它国家的学员。来自20个国家的学员在莫斯科的宗主教教会学校学习。

俄罗斯东正教的许多神职人员是在国外受教育的。目前，一

批东正教学徒在雅典大学、希腊教会学校、罗马梵帝冈（格里高里）大学就学。在国外求学的还有一些代表别的教派的学员。洗礼教派在民主德国布科瓦市的洗礼教教会学校学习；信仰天主教的在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波兰的华沙天主教学院就学；信仰穆斯林的在约旦国立大学、利比亚的伊斯兰大学、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学求学；佛教徒在尼泊尔、蒙古的乌兰巴托佛教学院就学等等。”

三、人与社会

“最近贵国有关社会公正问题写得很多，你们是怎样理解它的呢？”

“确实，在党的文件中、报刊上特别强调必须自始至终地贯彻执行在物质分配和精神福利领域中的社会公正路线。这一原则性问题在实际上得到解决。我们现在所谈的是，怎样采取更具体、更有效的措施，以便从分配机制中清除出非劳动收入、平均主义，清除出在我们社会中同经济规范和理想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怎样保障每个工作的人和每个集体的劳动报酬直接取决于最终劳动结果。我们指的是，要对那些真诚履行自己义务，劳动效率高的人给予应有奖励和提高他们的地位。相应地，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评估那些表现消极、无所事事，从事反社会活动的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对社会公正和将其原则付诸实践的理解。”

“苏联怎样解决培养新人的问题？”

“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在社会中与诚实，道德高尚的人（他们自然占大多数）同时出现一些在行为上和生活方式上只能称作是反社会的人。这是一些搞投机倒把、贪污受贿、骗子、酒鬼、嗜毒者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看来是因为在经济中和社会政策方面偏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而这不能不影响到社会意识和心理状态。关于造就新人的

声明，是从脱离了生活实践的抽象公式中引伸出来的。处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世界同表面上看来事事如意的世界越来越远。

依我们之见，新人只有在更新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通过丰富的亲身经验后，才能造就出来。任何训言、预言或思想工作——‘应当这样’，‘应该当一个主人，勤俭一些’，‘别偷东西！’，都无济于事，除非他自己置身于主人的地位。需要一段时间，使人们在这个条件下感到自如，获得独立，产生责任感，从而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感到自己确实是自由的。这样，他们的眼界会更宽广，人们对生活的看法也会不同，将形成新的思维、新的心理。”

“为什么苏联常说必须生产更多的日用消费品和提高其质量？这是否说明贵国的消费思想占了上风？”

“在苏联，消费量正在与日俱增。商品的产量不断增加，但某些商品的紧缺现象还存在。居民的不满情绪不仅在于商品缺乏，还在于其质量差。

苏联通过了1986—2000年发展人民消费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综合纲要。规定大幅度地增产一些商品，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品种多样化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全面满足苏联人对优质商品和其多样性日益增长的需求，是重要的社会纲领之一。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未能完成综合纲要中的一系列任务特别关注，责成相应部门、党和国家机构保障国民经济中这一方面的优先发展。

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的社会意识中，占上风的不是消费思想，而是同它抗衡的，拒绝接受西方‘消费模式’的思想。例如，在我国对合理需求这一问题曾进行过广泛争论。这里谈的不是限制人的兴趣，而是能培养和形成消费修养的一系列措施。

同时，谴责‘拜物主义’不是宣传放弃尘世福利的说教。对这种宣传苏联人会认为是不严肃的。”

“苏联人真的能有储蓄吗？”

“当然能。我国拥有78000多个储蓄所。储蓄所中的存款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保障这些存款的完备无缺。有关存款人的所有资料一律保密，包括其存款手续和存款的数额。

在储蓄所里存款是很合算的：存款人每年能领取2—3%的利息。有各种形式的存款。最普遍的是——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两种。青年存款形式越来越受欢迎。按规定，凡年满18—30岁的人，每月可以把一定数目的钱款转在自己的帐户上，年息为2%。如存款人3年内未动用过存款，他还将得到1.5%的奖励利息。也可以将钱存入现金—实物彩票中，所得款项以中彩形式支付。最大限额为10,000卢布。在办理作为遗产存款的文件手续时，向国家免交税金。”

“苏联公民交纳哪些税？”

“所得税是向职工收取的主要税金。所有在国家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如他每月工资超越70卢布，就要交纳所得税。如果收入达71—90卢布，交纳最低限额的所得税。公民收入达90—100卢布，交纳8.2%的所得税。收入每月超过100卢布的劳动者，从基数100卢布中交纳8.2%的所得税，而从剩余数额中交纳13%的所得税。

苏联集体农庄庄员主要交纳的是农业税，有宅旁园地的农村居民也要交纳税金。宅旁园地平均为1/4公顷的经营单位交纳的年均税金达25个卢布。因为土地、地下资源、河流和森林是属于国家绝对所有，所以农业税可以看作是土地的租金。

存在一种特殊的‘无子女税’。这项税主要是为了提高出生率，是所有无子女的男性必交纳的税（包括未婚男子），其年限从20—50岁。已婚的无子女妇女从20—45岁也都必须交纳这种税。如已婚夫妇一年之内未生育孩子，他们开始交纳这项税。无子女税占工资的6%。如果工资不到90卢布，则免税。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如拥有运输手段，同样得交纳税金。汽车的年平均税收为20卢布（等于加满一油箱的价格），摩托车收税3个卢布。

在租借地上建有私人住房的城市居民还得交纳两项税：国家每年向房主索取为造价1%的税金和土地税（一平方米约为一个戈比）。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公民平均每人交纳18个卢布。

从1987年5月1日起，个体劳动法在我国开始生效。从事这项劳动的人同样交纳税金，其多少按劳动性质和收入的多少来决定。

国家预算中，苏联公民交纳的税不起主要作用。它们只占预算的8.3%。”

“工人工资中扣除用于社会保险的金额是多少？”

“工人工资中并不扣除任何用于社会保险的钱款。用于社会保险目的的钱款一律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并由工会支配。这些资金用来支付养老金、各种补贴、病假费、疗养费、学龄儿童设施的维持费、体育—康复营和寄宿学校、敬老院和残疾病人院的维持费。

有权享受社会保险，是苏联人民的基本权利。为此，不从他

们工资中扣除任何钱款，也不预先交纳任何款项。它受到苏联宪法的保障（第43条）：‘苏联公民在年老、患病期间，在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失去供养者的人，都有权享受物质保障’。”

“在苏联报刊上进行过修改退休金法的讨论。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苏联现行的‘退休金法’是在1956年通过的。比起现在，当时，它更符合人们的迫切需求。当然，时间对它作了自己的修整：非止一次地提高过最低限额的养老金；1986年又提高了十年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额等。虽然如此，现行法律中很多条款仍不符合由时间提出的新的需求。就拿劳动报酬同退休金的比例来说吧。自1956年起，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增长了1.5倍，而最高的退休金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却一成未变。

试举另一个事例：现行的退休金法不能鼓励长期工龄的工作，在很多场合下，工龄为25年的同工龄为40年的人，领取相等的退休金。

现在，苏联劳动与社会问题国家委员会同一些其它主管部门在共同制订苏联关于劳动者退休保障法草案，其中规定，改善退休者的物质条件。其实质在于，每一个退休者的社会保障应根据每个人对劳动作出的贡献来决定。

此外，从1988年1月1日起，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为领取补加退休金额可以自愿交纳保险费。自然，它不触及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这里主要讲的是，任何一个人如他愿意的话，可以在退休时领取补加的退休金额（最大限额为50卢布）。为此，根据退休保险合同，他将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交纳保险费。当达到退休年龄时，这个人就不必再交纳保险费，反之，开始领取补加费。保险基金将以相等份额的劳动者资金和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的款项组成。”

“年轻家庭的预算由那些资金组成？他们是否能依靠自己的钱来维持家庭？”

“如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评估一下生活的一些现实情况。为此，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常见的事——男女双方结了婚，开始独立生活。

依据统计资料，结婚的女青年的平均年龄为21—22岁，男青年为22—24岁。社会调查资料表明，这种年龄的青年人要么在继续求学（两人领取的助学金约为100卢布），要么工作，并且是从从事低薪职别的工作，工资在100—120卢布范围内。对年龄较大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月平均工资略多于120—140卢布（全国的平均月工资为200卢布）。

年轻家庭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这同需要购买住宅（参加住房建筑合作社）、生育孩子有关。经济学家认为，年轻家庭中一个婴儿的诞生会大大降低他们的福利水平，就连现行的国家补贴制度也不能解决他们的一切财政问题。

年轻家庭的收入中，父母的帮助占重要位置。据粗略计算，靠家长帮助的青年家庭占55%。

还有一个可以充实一下年轻家庭收入的来源，就是额外再挣点钱，但这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可行的。再说，年轻人把自己的劳动精力分散到非生产领域，对国家也不利。

出路何在？看来，出路在于平衡社会政策，使青年人的收入和支出达到平衡。在这一方面一系列措施已开始付诸实现。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助学金有所提高，青年专门人材的工资也在增加。

一些企业和机关已经开始向年轻人提供无息贷款，以便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或用于购买家庭用具；向年轻人提供长期贷款。

如果能降低青年商品的价格，那么年轻人的经济条件会显著好转。例如，可以按简化了的工艺生产一些商品或用比较便宜的

材料制作商品——吸尘器和成套家具、廉价的衣服、低耗能的冰箱，其使用性能虽然低于一般的，但年轻人买得起。”

“苏联是否存在住房问题？”

“为了使我们能设想住房问题的规模及解决它的困难程度，这里需要提醒一下，我们已经两次着手解决过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十月革命后，那时有几十万无家可归的人，当时，不仅在一个单元中居住着几个家庭，甚至在一间房间里住上几家人。

第二次，是在战后时期。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迫使我们再次着手解决住房问题。每七个侥幸活下来的人中有一个人根本无住房，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人总共达1亿人（大约全国人口的一半）。

在50年代，苏联建立了‘住房生产线’的工业，自那时起，它一直保持着每年建造200—220万套单元住房和独家住房的‘节奏’。但是在如此高的建设速度和如此大的建筑规模下，要同时保证建筑的高水平和舒适程度，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迁入这些新房的住户，20—25年之后又成了改善居住条件的对象。他们要求更宽敞和更舒适的住房。同时，人口也在增长：每年增长200—300万人。象西伯利亚、北方、远东这些新开发的经济区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并需要建筑住房。这些地区建筑房屋的费用要比中央地区的高好几倍。

尽管如此，我们不顾解决住房问题中的困难，到2000年必将保障每个家庭都有单独的住房或独家独房。这是我们社会纲领中最重要的纲领之一。为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正在改变住房建设的计划原则本身。计划中先后次序的改变，将使建筑单位不是从总体上来计算建筑量，而是以具体单元为出发点，同时也考虑到人口的状况。

正在为加快建筑速度和提高建筑质量寻找补充资金。为此目的，补加了10%的基本投资。

现在，特别重视怎样更公正地分配住房问题。怎样更有效地利用现有住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苏联家庭有权购买房子吗？”

“绝大多数市民拥有的住房是属于国家的。迁居国家出资建造的住房，房主不支付任何资金并无限期地转交其家属居住。每月的租金，包括公共费用在内，平均只为职工家庭收入的3%。不过也可以购买住房，而且也可以成为住房建筑合作社的成员。合作社住房占苏联住房建筑的8%。这些住房是依靠银行向国家机关提供的贷款建造的，而地皮则是免费提供的。

在某种情况下，企业、组织等单位自己无偿地拨出款项用于偿还部分贷款。”

“私人住房值多少钱？一般的家庭是否买得起？”

“私人住房的价格是比较高的，达15000—25000卢布，也有更贵的。自然，很多家庭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因此，居住在农村的公民在建造带有院内建筑物的私人房屋时，向他们提供20000卢布的贷款，50年内偿清。如需要改建或大修私人房屋，建造院内建筑物——牛棚、鸡棚、农产品贮藏室，也可以要求贷款，其数目达4000卢布，10年内偿清并从贷款的第3年开始偿还。

在城市里和城市型的村镇上，为建造带有院内建筑物的私人住房提供不多于20000卢布的贷款，25年内偿清。为改建、大修或建造院内建筑物提供3000卢布的贷款，10年内偿清。

如果有谁不想建造房屋而是想买现存的私人房屋，或为某些私人建筑项目购买设备，同样可以要求贷款。

就同提供地皮一样，发放贷款的优先权属于那些急待改善居住条件的人。

企业、单位、集体农庄等在劳动集体的赞同下可以部分地为某人偿清为建筑私人房屋提供的贷款。这些资金是从社会发展基金中拨出的。这项优待条款，首先是面向工作认真的人，除此还须考虑这人工龄的长短。

地方苏维埃执委会可以从自己的基金中向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残疾人员和伟大卫国战争参战人员以补助费形式偿还部分贷款。”

“贵国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小轿车来满足私人用途？”

“当苏联在1928年生产出50辆小轿车时，在北美和西欧生产的轿车曾以百万部计。随后，苏联遭到希特勒的侵略，4年战争给国民财富造成1/3的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住房。

自然，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就顾不上私人汽车的生产。除此之外，我们考虑到西方汽车大众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将私人汽车让位于公共交通工具。城市中开始广泛发展电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线路网。我们继续建筑莫斯科的地铁（第一条线路于1935年5月通车），开始为在其它大城市建设地铁做准备工作。

今天，苏联的11个城市有地铁。莫斯科的地铁无疑是最大的。平均一昼夜乘客达800万人次。地铁是最受欢迎的一种交通工具。其中有好几个原因：速度快——上下班高峰时，列车间隔时间为

一分钟。再说，从一个市区到另一个市区，坐地铁比坐汽车要方便和快得多；地铁干净井井有条——看不到乱扔的垃圾或抽烟的人。最后，地铁票价便宜，不管路程的远近和转车的次数，票价一律为 5 个戈比。自地铁建成起，票价未变动过。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我们的问题吧。今天苏联的汽车制造厂每年生产 130 万辆小汽车，但目前还是供不应求。我们在发展汽车工业时的出发点是私人汽车取代不了公共交通，因此公共交通应该比较舒适和象以往一样便宜。”

“苏联人为保健休息拥有哪些条件？”

“在疗养院、疗养区休息，是任何一个苏联人都能享受的。 $\frac{1}{5}$ 的疗养券（通常 24 天）是免费的，在那里休息是同治疗相结合的。 $\frac{1}{10}$ 的休养券也是免费提供的，绝大多数证券只以 30% 的价格收费，其余的 70% 从由工会支配的社会保险预算中支付。

我们再补充几句，在苏联共有 300 多个疗养地。有 6500 万人（每 4 个人中就有 1 个），每年在 16000 个疗养院和休养所休养和治疗。我国有 500 多处矿泉疗养地，700 处泥疗地，450 个属于休息和疗养气候最佳的地方。怎样使劳动者能更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性，这是我们的专家正在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苏联庆祝哪些节日？是否存在民族仪式和风俗？”

“苏联人有很多节日。这是一些全民节日，如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庆祝日（11 月 7 日），苏联宪法节（10 月 7 日），苏联

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胜利的节日（5月9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新年（1月1日）。每年庆祝自己职业节的有：医务人员、化学工作者、矿工、建筑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等。

同世界各地一样，还隆重庆贺生日、婚礼、乔迁新居。

自古以来俄国各民族中存在着送冬和迎春的习俗。这些活动起源于远古时代，当时，一个人有时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显得无能为力，而冬末和立春又同寒流的减退和大自然的苏醒相联。作为远古异教习俗的谢肉节至今流传在我们中间——迎春节，日长多阳又暖和。这些天大家都吃形状上和颜色上都象太阳的发面煎饼。

送冬和迎春仪式在各地区都不相同。例如，在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苏兹达利，每逢送冬迎春时，在街上举行带有俄罗斯歌舞的戏装表演，举行欢快的冬季游戏和滑雪车。设在中央广场上的小卖部里可以吃到发面煎饼、饮茶、买些纪念品——民间手工艺品。

习俗、仪式、传统，是把祖先的文化遗产传给下代人的手段之一。当你参加苏联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歌咏节时，就会想到这一点。合唱歌曲的创作是该地区人民的传统。当你倾听在塔林市郊歌咏场上的大合唱时（由业余和职业歌手联唱的千人大合唱）。你就会确信，对昔日习俗的珍惜态度深深扎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不能不谈到产生于苏维埃时代的一些风俗习惯：隆重欢送青年参军、授予专业称号仪式。青年婚礼和不少其它仪式。在列宁格勒登记出生婴儿的‘小宝宝’宫，发给父母出生证书的同时授予‘生于列宁格勒’的纪念奖章，上面刻有婴儿出生的日期。

4月1日是一个非正式节日。日历上没有把这一天定为笑声节，但在敖德萨，多年来一直举行‘幽默利纳’——幽默和讽刺联欢节。从1986年起，莫斯科也开始举行这种活动。联欢节的节目中有：化装游行，著名演员和讽刺作家的演说，音乐家们的表演。

苏联人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节日、习俗和仪式。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着,因为它们同人民的精神生活是分不开的。”

“苏联人口前景如何?”

“苏联有2.845亿人口。1987年人口增长了280万。我们认为,这些数字不能使我们说我国的人口状况良好。今后的人口发展情况又如何呢?对过去历史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展望未来。从60年代初起,苏联人口的出生率显著下降,并在1969年达到最低水平。出生率的降低,可以说是‘战争的回声’和在60年代由于妇女涌入社会生产领域并向只生一两个孩子‘过渡’,对社会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

50年代的一代人多少改善了人口状况:正是靠这一代人,在70年代出现了出生率增长的趋向。但是,这只不过是居民结构起了变化才产生的良好结果,随之,‘战争的回声’理应消失。

当然,一个家庭准备生一个孩子取决于一系列情况:经济条件,母亲为照管孩子需要能更长时间不工作。80年代初,我国为帮助一些有子女的家庭采取了一些措施。妇女除了产前产后各为56天照领工资的产假期外,得到为照管不满周岁婴儿领取部分工资的假期和直至婴儿满1.5岁不领取工资的假期。每个婴儿出生时可以领到一次补贴费等等。

当年曾经对妇女是怎样利用这些优待进行了社会人口调查:在家照管孩子满周岁的妇女达80%;照管孩子至1.5岁的妇女比以前增加了7倍。时隔一年,生第3个孩子的家庭增长了14%,生第4个孩子的成长了10%。有4至5个孩子家庭的比重也增加了。

当然,以前为了使妇女能把自己做母亲的责任同工作更好地

结合起来，做到两头兼顾，做了不少努力。但这一结合原则被过于简单化了。身为母亲的妇女的生活方式从两种类型中选出一种：要么做家庭妇女，要么把婴儿送往托儿所，而自己与男同志一样工作。

社会为第二类妇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是出生率下降了，而且家庭也失去了稳固性。因为过早地放弃对婴儿的照料，使夫妇失去了做家长的幸福，失去了对共同生活意义的理解。因此，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伴随了离婚案的增多，并非偶然。

现在向苏联妇女提供了新的优待。在最近的将来，与产前假期延长的同时，妇女为照料婴儿得到部分工资照发的假期和不领工资的假期还要延长半年。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如妇女愿意的话，她可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法律规定妇女可按非全工作日、非全工作周制或按时间不固定的工作表工作。然而，社会教育系统不因此而缩减。实际上，现在同时在建立两个新型的社会模式——为工作的母亲创造最佳生活方式和家庭与社会教育孩子的最佳配合方法。

尽管如此，问题继续存在而且比较严重。”

“不久前苏联建立了儿童基金会。这个组织对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

“关怀孤儿、关怀失去父母照料的孩子和残废儿童，是苏联儿童基金会的主要任务。这个基金会是根据社会人士提出的倡议建立的。任何一个儿童的命运不应当弃置于社会关怀之外——这是作家和教师、医生、演员、新闻工作者和学者做出的决定，并把精力集中于这一事项上。参加创建儿童基金会的有：苏联和平基金会和苏联文化基金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妇女委员会、所有的创作协会、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苏联工

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列宁共青团中央、各部、各科学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出版机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苏联颇受欢迎的青年杂志《接班人》主编、作家利哈诺夫为基金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他是这一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始人。

苏联儿童基金会的银行帐户为707，到1988年底，汇给基金会的自愿捐款达1.25亿（这是苏联各企业、机关和个人的自愿捐款）。在苏联外贸银行建立的帐户为7070，外国公民也向该基金会捐献自己的钱款。

这些资金是怎样利用的呢？首先作为对专门儿童机构的援助。国家对这些机构承担全部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从预算中拨出巨额资金来维持育婴院、保育院和孤儿寄宿学校，今天那里有30万名儿童受到教育。但是其中只有1/5的机构算是合格的，必须改善许多机构的物质保障，教师、保育员、技术人员紧缺。

比较具体地拟定了给予儿童社会帮助的计划。例如，在黑海疗养地的‘阿纳帕’为残废儿童建筑疗养院，为有智力缺陷的儿童建造治疗中心，一系列专科门诊部，为在莫斯科休息的儿童建立游艺城（犹如迪斯尼乐园），儿童音乐学院等。

从1988年1月起开始出版苏联儿童基金会的机关刊物——《家庭》。顾名思义，家庭问题，家庭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精神状态，是苏联儿童基金会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因为正是在家庭环境中滋长着现代道德的弊端——对儿童的麻木不仁、家长的私利心、残酷。利哈诺夫说：‘我们应当建立一种在我们社会结构中唯一可行的崇拜，即家庭的崇拜……’

除了这些预防性措施外，儿童基金会还担负另外的职能：发现有擅长的儿童并组织给予他们帮助，同吸毒和儿童犯罪行为作斗争，吸引具有高度技能的教师参加保育院的工作，从自己的基金中支付保育员们的附加工资。促使科学、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对少年进行伦理和审美观的教育，同时，参加对因受战争、自然灾害、传染病伤害的各国儿童给予国际援助的活动。

苏联儿童基金会组织委员会每天收到上百封信，每天要接到几十个由各种人、集体打来的电话，他们提出给予具体的帮助、建议、出主意。这说明在儿童问题上社会饱经了痛苦，大众组织的建立有助于把那些视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把那些能使别人的孩子分享自己给予亲生儿女温暖的人吸引进来解决问题。”

“一些人说，世界上的文盲在减少。另一些人说，相反，它在增加。到底谁对谁错？苏联的情况如何？”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世界上的文盲人数（15岁以上的）不断增加。到1990年预料将达8.84亿，1980年是8.14亿而1970年是7亿人。

世界上成人文盲中的平均人数从相对数来说，在逐步地减少：1970年—32%，1980年—29%，1990年（预测）—26%。但是文盲的绝对数在增加。到1990年，文盲象我们已提到那样，要比1980年多7000万人。

不过，这种推算未把群众性地扫盲运动包括在内，而这个运动的现实性和有效性是不可忽视的。

至于苏联，我们是被迫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1906年，沙皇教育部出版的《教育通报》杂志作过测算：要使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居民全部识字，只有在120年之后才能做到，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需要430年，而在中亚细亚则需要4600年。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只消几十年的时间就在一个多民族国家范围内扫除了文盲。

在苏联几乎任何一种教育都是免费的，并且人人都能享受。还在30年代，小学教育就成了义务性的，到50—60年代——八年

级义务教育，在70年代——普及十年制中等义务教育，苏联社会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化的国家之一。今天在苏联进行的教育改革，将进一步使它沿这条道路向前发展。我们要使苏联教育体系更完善、更现代化。”

“贵国如何对待环保问题？”

“我们同世界各国一样，对解决这些问题深感忧虑。我国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在最近10年里，苏联污水的排放量减少了 $\frac{1}{3}$ ，提高了大约100个大城市中的空气洁净程度。但也有一些地区和城市中的生态情况在恶化。众所周知，苏联准备在2000年把工业生产翻一番，这就是说，将加重自然环境的负担。因此我国开始制订全国性的生态计划，其目的是使经济活动和生态政策协调、平衡。

苏联已开始的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应当协助怎样更合理地利用大自然。在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条件下，向违反大自然保护法单位索取的罚款将直接从集体的收入中扣除。除此之外，正在推行征收自然资源利用费的措施。如果出现必须利用昂贵的保护大自然的工艺，企业可以动用集中的基本投资，更不用说利用地方管理机构的资金。

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在解决环保问题方面日益增长的社会舆论的作用。举个明显的例子，巨大的工程项目之一——部分北水南调的工程被迫停止。社会公众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会引起不良的生态后果。

在不为某部管理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监督生态计划实施情况的机构。例如，同学者和经营者一起参加监督贝加尔湖流域自然环境情况委员会的还有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它们举行的会议一律是公开的。

我们希望新经营制度和新工艺的建立，自然还有广大公众的积极行动，将发挥自己的保护作用。”

“是否可以说在苏联吸毒如同在西方一样普遍和危险？”

“吸毒是一种病态，不管其地理位置，它的后果无疑是危险的。何况，对吸毒者进行治疗是当今世界非常尖锐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据掌握的资料，只有10%上了瘾的吸毒者经过治疗恢复为正常的人。

关于吸毒流行的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数字：在美国经登记的吸毒者达2200万，有22%的居民试服过一次。在法国有100万。在我国经登记的有13万吸毒者，其中52000人被认为是吸毒者。

使人感到最不安的是这一可怕的疾病在日益增多，据统计资料表明，这些麻醉剂使用者中有14000名未成年的吸毒者。

当然，这里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统计数字。遗憾的是，无论是医学还是治安部门都没有发现早期服用者的多少有效的手段。

虽然苏联集中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同吸毒作斗争，但问题的解决并非所希望的那么容易和那么快。”

“苏联运动员可以划归为哪一类：职业运动员还是业余运动员？”

“我们看问题不能从‘或者，还是’出发，这是不对的。这远非那么简单，有些人不服气地说：他自己在跑跑和跳跳中寻找乐趣，还得给他上千元钱？如果我们只是设想一下，仅是因为跳和跑可以拿到几十万元……而且还是美元，心里又有何感？众所

周知，国际象棋手一直把下棋作为自己的职业，这并非是什么秘密，但过去大家都避而不谈。

新时代——新思维。现在那些主要是在国外进行比赛的人——网球手、自行车赛者被宣布为职业家。而足球运动员则在国内已被公认为是职业运动员。接踵而来的将是冰球运动员。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国家体委。当年，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和在冰上舞蹈新风格的创立人柳·帕霍莫娃和亚·戈尔什科夫曾提出允许他们在托勒尔·克伦斯顿音乐舞蹈团体中表演一年的要求被拒绝。现在有许多情况改变了。苏联足球锦标赛的射门好手奥·布洛辛在奥地利，瓦·希迪阿杜林在法国的‘杜鲁泽’，扎瓦洛夫在意大利的‘尤文杜斯’

国家体委在学习赚几百元，而不是扔掉钱。只有报酬才能确定运动员的水平，即运动员的职业技能，但是报酬问题至今未解决。

世界象棋冠军加·卡斯帕罗夫认为，现在应该坦率地指出：‘苏联的体育应当取得职业身份。’卡斯帕罗夫断言，存在两种概念——‘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后者被前者所排挤。如果国家体委在财政上是自负盈亏的话，那么，建立在30年代的将优中择优的运动员推向大众体育这座金字塔顶峰的作法，就要耗费巨大的资金。

很多人认为，大部分资金必须用于不是去追求体育荣誉，而只满足于星期天打网球的那些人。但是，网球拍缺乏，没有网球，再说场地也不够。与此同时，兹维列娃和契斯诺科夫一年却挣近100万美元（说实话，他们只拿到其中的1/200）。

目前国家体委正在制定奖牌制改革的宗旨，归根到底在于划分两个流派。但划分流派本身就已经是把体育分为职业性的和业余性的两种，换言之，划为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两种性质。

可是，那些体育运动职业的狂热拥护者在争论激烈时往往忘记最简单的论据。目前还不允许大批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因此要谈改变运动员身份的问题，显然是不严肃的。然而，你未必能使任何一个真正热衷于体育的人，更不用说要使专家相信某运

动员在游泳池中和他在大学里进行考试可以同样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象在高速公路路边的木牌上写着的一句话一样：‘如果您边驾车边拥抱姑娘，那么您该知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样干得很糟’。不好的记录是不存在的，记录要么有，要么没有。最终结论由你们自己下。

对我们来说，目前讨论类似问题过程本身就已经很有价值了。如果我们翻阅一下三年前的报刊，这些问题似乎根本不存在。运动员们受到猛烈的攻击，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他们寄生于国家预算上。卡斯帕罗夫很想知道，国内是否有哪个企业在几年内上交200万瑞士法郎（他本人上交的要比这还多）。他喜欢重复‘业余爱好者的体育’和‘国际标准’两词今天是互不相容的。无疑，苏联体育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但今后怎样，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改变习惯的思维要比改变任何别的事物困难得多。习惯的思维方法不认为从早到晚在冰场上滑冰或滑雪是一种工作。

那么现在苏联运动员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职业家呢？从他们每月领取的报酬来看，无疑是爱好者。如从其一天的工作来看，他们是职业家。由此可见，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是单一的。”

四、对外政策

“贵国目前在国际关系中采取的新态度是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不。我们国家的奠基人弗·列宁早就强调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进行合作的必要性。

自然，现在正在形成的新思维并非是一般地仿效必须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平共处主要是意味着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联系。新思维是以除和平共处外别无选择为出发点的。在核弹和洲际导弹时代，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销毁地球上的文明，也可能是生命本身的灭绝。由此可见，新思维反映了新现实，人类生活的新条件。在今日的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应该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

现在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前提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那么这是否等于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的学说呢？当然不是。我们把不同于我国社会制度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自己的伙伴，但现代人类最富有建设性的社会力量，善于协助其联合和为巩固和平起决定性作用乃是工人阶级。自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换言之，劳动者的阶级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全人类利益而牺牲阶级利益。”

“呼吁进行新的政治思维，是否仅是一纸宣言呢？”

“可以肯定地说，新政治思维不是一般的宣言或口号。这是行动的哲学、生活的哲学。

苏联提出的取得安全和持久和平的观念反映在行动中，反映在政治和外交工作作风中。一种致力于对话、诚实的对话，互不欺骗。不以对方的失误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对话的思想占居优势。

苏联、华约其它缔约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欧洲所有国家提出了把武装力量削减到合理限度的建议。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将两组织的军事学说进行比较的建议，使其具有纯粹的防御性质。

1987年5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将自己的军事学说公布于众。它是纯属防御性质的并服从于主要目的——既防止世界核战争，也防止常规的世界大战。从这一文件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自己不遭受武装侵犯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其它国家采取武装行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会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华沙条约组织对任何一国，都没有领土要求。不把任何一国，任何一国人民当作敌人。

新思维，新思维的全人类准则，它以理智和开放性为取向，在世界实践中开始为自己开辟道路。

我们承认以往采取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态度影响了我国的对外政策。能够承认这一点，也就是真正新的政治思维的标志。可见，这并非是一纸宣言。

新政治思维也带来了现实的成果：苏美消除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和为付诸其实现而迈出的头几步。当然，不得不考虑到国际局势仍然紧张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仍将为自己的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做出一切努力。

无核世界和安全世界纲领本身的正确性不仅受到其严格科学依据的检验，同时，也受到事态进程的检验，而事态的进程又有各种新生力量的作用形成的。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把捍卫和平的事业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向未来无核世界的途径就会越稳健、越短。”

“为什么西方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接受新政治思维原则？能否谈谈你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心理因素起作用。原因在于人的心理具有惰性。对人来说，要改变习以为常的观点是很困难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吧，人们在很长时间内深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运转的，甚至当科学家们不可辩驳地证实了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运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实践家们又基于这一由科学证实了的真理开始在海洋中广泛利用方位判定法时，绝大多数人还是坚持自己过去的看法。而那些呼吁改变自己思维以至于使人恼火的人，常因此而遭到迫害。

如果我们从追溯历史转向现代政治，那么应该说，今天，传统的政治思维远不比太阳绕地球运转或地球由三大台柱支撑着的假设年轻。

旧的政治思维是以损人利己为基础的。你的安全意味着威胁别人的安全，你的繁荣昌盛意味着别人的衰败灭亡等等。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这当然是荒谬到极点了。我们同舟航行于大洋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值得夺取划船人手中的桨呢？

有些人还因别的原因反对确立新政治思维。在西方还有不少人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收入、前程担心，在新政治思维条件下，支配世界的将不是幻影和偏见，而是理智和现实主义。

但有很多人对新思维所以持谨慎和怀疑态度，是纯属亚当后裔所固有的心理上的惰性所致。而这个惰性会给人类来个恶作剧。”

“军事上的均衡是否能成为普遍安全的可靠基础？”

“均衡，是平等的意思。平等一词本身包含着一种吸引力，甚至起着一种镇静的作用。的确如此。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武力上的优势就是威胁。这是很大的威胁，要消除这个威胁，必须恢复或建立平等。

这种态度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然而，战后的军备竞赛却说明了另一点。军备竞赛把军事上的平等提高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致于对全人类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均衡——只有建立在越来越低的武装水平上，安全的稳固性才会增强，而零点均衡能保证最理想的安全。

要达到这一地步还远着呢。在裁军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头几步，而目前，我们还在继续研制和生产新型武器。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种趋向的集中表现。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将重审自己对均衡、军事上的平等、平衡原则本身的态度。我们以前把它作为自己的和盟国安全的基础。现在认为，没有必要达到‘镜面般’的平等，使两国武库如出一辙，这甚至是不适宜的。即，不追求把潜在敌方的新型武器同自己的类似型号的武器平衡起来。重要的是不能使对方为自己不受惩罚的侵略创造条件。

这就是华沙条约组织通过的新军事战略的实质，它包含着理智和足够的防御能力。

目前产生了这么一种情况，一方能把对方（顺便把全人类）消灭好几次。

的确，非常重要的、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是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有助于较顺利的解决这—问题是放弃对‘均衡’、‘军事平等’的盲目崇拜，因为它可能，而且也确实在军备竞赛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贵国是否想把美国排挤出欧洲？”

“由于苏美签署了消除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协议，人们经常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协议涉及所有的导弹库，无论其部署在哪里。但由于美国的大部分导弹部署在欧洲，因此，消除这一级别的核武器常被视为是美国‘离开’欧洲的开始，自然被认为是在苏联的‘压力’下‘离开’。

实际上，苏联并不打算把美国排挤出欧洲。相反，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签署了国际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对恢复和巩固欧洲的和平负有责任。在苏联同自己的反法西斯联盟的盟友，包括美国在内粉碎了欧洲文明的凶恶敌人——纳粹帝国后不久签署的波茨坦协定的极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此。

苏联略后签署了不少规定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的协定。

其中有：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33个欧洲国家，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这次会议的文件），除此，还有苏联、法国、美国 and 英国政府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

在签署关于苏美消除两个级别的导弹协定时，苏联没有期望从欧洲‘排挤掉’美国，同样，美方看来也未为自己离开旧大陆铺垫道路。当时的用意是：使欧洲和全世界向摆脱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核武器重担的方向迈出头一步。能达到这一目的，对欧洲，对整个世界来说有益而无害。”

“苏联时常强调，似乎西方塑造了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苏联公民的形象。依你们看来，是否存在摧毁这种刻板形象的可能性？”

“类似的刻板形象，是旧思维的产物。按照这种思维，双方的对立是一个死圈。从这种立场出发，任何争执问题将得不到解决。一方的任何行为激起另一方的反应，而且这一反应往往是不对等的。由于西方大众信息手段塑造了苏联的错误形象，由于它歪曲苏联领导人的意向，才出现了上述行为。情绪在国际交往中是个要不得的顾问，再说，西方读者和观众已蕴酿着实际上是否定性质的情绪。

用什么办法来消除西方人们意识中产生的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那些失真的概念呢？苏联的公开性政策朝这一方向迈出了坚决的一步。苏联比以往更坚决地主张发展文化和人文合作，主张人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主张广泛地和自由地交换意见。

例如，苏美社会人士在尤尔马拉、查托库阿和第比利斯的会见，沿伏尔加、第聂伯和密西西比河上举行的苏美联合和平旅游，文艺活动家举办的伊塞克湖国际论坛，其会议已在吉尔吉斯和瑞士举行过。其中占特殊地位的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大会，这个大会聚集了上百计著名的文艺活动家。

我们开始经常举办苏联、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各城市间的电视桥节目。

苏联的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同国际关系的改造紧密相联，而国际关系的改造是以真正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苏联提出在莫斯科举行有关人文问题各方面的世界大会，就是一个明证。

摧毁业已形成的刻板形象，有利于所有国家和人民。”

“你们是否认为巩固和平的问题首先 应由大国来关心？”

“苏联对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所持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予以极大的注意。例如，1987年5月，在塞浦路斯举行了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的会晤，他们都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与会国。部长们表示要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和平平衡的总结文件。莫斯科立即注意到这一点，表示支持这一立场并声明，苏联为达到同一目的将采取积极步骤。

在东西方的立场处于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倡议不止一次地在多边会谈中帮助走出这条死胡同。

结论很清楚：‘小国’关心国际气候的好转，它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世界的命运有很大的意义。

不仅仅是欧洲的‘小国’起着不小的作用，世界还倾听不结盟运动的参加国、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倾听代表着地球上千百万人的其它区域性和宗教性联盟参加者的意见。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士和坦桑尼亚六国首脑的主动立场。他们呼吁全面禁止试验、生产、部署核武器，包括其运载手段，同时禁止宇宙军备。这些国家首脑呼吁立即和循序渐进地裁减核力量。他们表达了人类大部分人的意志和宿愿。

同时，不能否定拥有核武器的和无比强大的工业潜力的大国所负的特别责任。”

“苏联如何看待不结盟运动？”

“我们把这一颇有影响的运动视为许多国家利益的代表。首先代表解放了的亚、非、拉美国家。我们反对通过东西方对立的折射镜来看不结盟运动。苏联完全理解不结盟国家不参与任何军事政治集团、执行独立自主政策、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意向。

苏联对1986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9届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例行会议的良好结果表示满意。

苏联完全有理由把100多个国家（大约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三分之二）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看作是一支相当大的力量，这支力量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切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上作出建设性贡献。换言之，不结盟运动增加着和平、理智和善意潜力的力量。这一点在今天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不把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就不能解决现代世界的首要任务——防止核惨祸的发生，争取以发展和进步为目标的实际裁军。

在这一方面，如同许多其它方面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同不结盟运动参加国的切身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同这些国家发展友谊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

“苏联说在解决亚太地区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态度。具体地表现在哪里？”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发表讲话，邀请各有关方面考虑改革亚太地区各国间关系的计划。

1988年9月，苏联领导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讲话时，就这一计划提出了新的具体建议。

以下我们简明地阐述一下这些建议的要点：

苏联就象早已在做的那样，不准备在该地区增加任何核武器并同时呼吁美国和其它核大国不在该地区补充部署核武器。

邀请所有主要的海军大国就不在该区域增强海军力量问题进行磋商。

建议在多边基础上讨论有关降低靠近苏联、中国、日本、民主朝鲜和南朝鲜沿岸地区的军事对抗。

如果美国将拆除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那么苏联在同越南政府商妥后，放弃在金兰湾的苏联海军物质技术供应站。

建议在不迟于1990年召开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国际会议。

建议在任何一级水平上和由任何人数组成的会议上讨论建立谈判机制的问题，旨在审核由苏联和其它国家提出的关于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建议。这先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中国、美国之间进行讨论。

目前这种讨论还没有开始，谈判机制还未形成。但苏联在1981—1990年已单方面的把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兵员裁减了20万人，其中包括在远东的12万人。苏联太平洋舰队使16艘舰艇退出现役。’

“苏中关系发展的情况如何？”

“苏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大国。它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因此，自然我们两国就当代一些主要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苏中两国间的关系有着明显地改善。

在这一方面，1989年春出现了真正的突破。中断了30年的关系后，两大国的领导人举行了高级会晤。

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了世界上的稳定局面。在访问期间，双方不止一次地强调准备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所有争端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双方决定不再回到50年代的关系，摆脱60—70年代的对峙状态。两国领导人表示要变世界最长（7,500公里）的两国国界为友好边界。为此，双方将采取措施把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裁减到最低水平，使其符合两国间的正常睦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苏联宣布从蒙古撤出75%的军队。

两国商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和有计划地发展经贸、科技、文化和其它领域中的联系。

苏共和中共两党关系得到恢复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声称，他们特别重视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进行对话的意义，并准备今后保持这种接触和对话。”

“苏联人民是否了解中国今天在联合国的活动情况？”

“当然。苏联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采取的任何步骤都予以极大的注意。例如，苏联对中国把有关自己在裁军领域中所采取的具体步骤的资料提交给联合国审议表示非常满意。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外长钱其琛通报了有关中国在1987年完成单方面削减本国武装力量100万人一事。在苏联，同样知道中国把许多军用机场和海港全部地或部分地改为民用项目，而相当大数量的军工企业转向生产非军事产品的情况。”

“苏联报刊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有多广？”

“有关中国的信息经常刊登在中央报刊上和杂志上。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播放有关中国的情况。

其内容多种多样：有关中国沿海地区建立的自由经济区、军队生活中的变化、生产和贸易中的新方法、民族节日、艺术、教育、家庭情况、医学研究……

擅长分析的文章和报道比较引人注目，它们由《真理报》、《消息报》、《新时代》杂志、《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杂志、《文学报》的新闻记者编写的。例如，1988年底，《真理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登载了有关邓小平同志政治生平的文章。苏联记者也采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苏大使。

《在国外》周刊经常译载中国报刊和外国报刊有关中国国内外政策的文章。

中央机关报、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刊登和播放‘新华社’的正式通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新任命、提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发射人造卫星、核试验、自然灾害、各种意外灾难。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发生的事件和存在的问题的报道面极广。

报上也刊登两国领导人在两国国庆之际互致的贺电，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和在本国招待外国贵宾的情况。

应当补充一点，我们还刊登不少插画的材料，这是一些讲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奇异的和有趣的资料。

苏联报刊和其它一些大众信息手段对苏中关系在各领域中的发展情况反应很敏感。例如，报道边境谈判的进程、包括边境贸易在内的贸易发展情况，也报道现在已经经常举行的副外长级的苏中磋商。特别注重1988年下半年举行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初步磋商。

来自中国的专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等，越来越成为苏联的常客。他们成了苏联记者必定采访的对象。

苏联大众信息工具广泛报导了戈尔巴乔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除对谈判进程作了详细报导外，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对中国学者的采访到中国烹调中的奥密。”

“苏中两国的文化联系的发展情况怎样？”

“截至1990年苏中两国文化领域中的合作计划规定在三个方面进行交换：交流演员、展览会和代表团。

在苏中两国演员交流范围内，两国每年将互换一个文艺团体。南京民族乐队在1988年7月首先在苏联进行了演出。该乐队在我国一系列城市的演出很成功。在1988年底，驰名于国内外的国立库班哥萨克合唱团在中国进行了巡回演出。

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的芭蕾舞团预定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巡回演出。195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之际，中国观众首次在北京观看了苏联大剧院演员的演出。1989年苏联观众将能看到中国民族歌舞团的演出。再过一年，两国杂技团将进行互访。

展览会的交流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1988年中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首先在莫斯科的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然后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办了“中国现代瓷器和陶器展览会”。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了“中亚各族人民和哈萨克人民的工艺和装饰艺术展览会”。南昌、福州和北京的观众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今后几年里，苏联将在中国举办“青年画家创作”和“伟大卫国战争珍品”展览会。而在苏联的博物馆里将展出现代中国国画和传统的湖北民间工艺。

苏中两国将显著扩大文艺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恢复了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和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之间的创作联系。苏联文化部全苏艺术学研究所同中国艺术科学院之间签置了合作议定书。莫斯科、列宁格勒、北京、上海和其它城市的文艺单位进行了互访，今后还将继续进行。

除此之外，还将发展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如交换剧本、互派排演团体和导演。将扩大电影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之间的联系。”

“苏联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关系如何？”

“苏联致力同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发展双边关系。莫斯科的这一原则性的立场也同样关系到苏联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二十几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和多方面的区域性合作经验。该联盟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整个亚太地区成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苏联不断地注视着东盟国家在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和合作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苏联与东盟国家在现代根本问题上，即在消除核武器、保持宇宙空间的和平和销毁化学武器方面的立场接近或完全一致。

苏联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东盟国家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和平与合作区的倡议，有关变东南亚为无核区的思想。

苏联一贯反对建立军政小集团，我国就东盟国家领导人发表关于该联盟无论是今天还是今后，都将不带有军事性质的声明表示欢迎。

苏联坚持今后继续巩固和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最近，同东盟国家各种形式的联系，其中包括高水平级的政治对话，显著地活跃了起来。但是，苏联同这些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远远不符合现有的良好的可能性。应当朝这个方面做更大的努力。”

“苏联对近东问题采取什么立场？”

“1984年7月29日，苏联就解决近东问题提出的建议中强调指出，解决办法必须是一揽子的和公正的。一揽子的解决办法是

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因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冲突引起的问题都应得到解决。除此之外，它应包括参与这一冲突的有关各方。

如果我们只以相应的国际安全保障的准则保障以色列安全，而鄙视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除以色列军队；或相反，被占领的土地获得解放，而以色列却得不到其安全生存的保证，难道能够设想近东冲突问题会多少得到稳定的解决吗？

对苏联提出的有关公正调解近东问题的要求，常有人说：对‘公正’的理解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各方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但众所周知，存在着被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及其宪章。国际社会积累了不少解决国际关系中发生冲突和争端的经验，因此，可以对‘公正’一词的理解作出明确的和正确的鉴定。

苏联在1984年7月29日提出的建议包含了一揽子调解近东问题的原则，并确信这些建议对参与近东冲突的各方都是公证的。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些建议规定了以色列归还自1967年以来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阿拉伯对这些领土的主权。这些建议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也是公正的，因为规定了实现其不可分割的权利，首先是自主权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同样，对以色列来说，也是公正的，因为它保证了以色列在公认的版图内和平和安全的条件，它的版图不受侵犯。

按苏联的看法，近东冲突的解决应当由联合国来保障。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

苏联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88年底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它呼吁以联合国安理会242和338号两项决议为基础，召开世界和平会议。这两项决议承认该区域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有权在安全的和被公认的疆界内和平生活。这样，以色列获得同巴勒斯坦举行对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可能性。顺便指出，美国已做到了这一点。”

“苏联对南非问题的政治调解取得的进展持何态度？”

“苏联曾公开地和明确地声明过，无论在该地区还是世界另一个地区，它不追求任何特殊利益。苏联使各国确信，它对非洲发生暴乱，对破坏业已形成的传统的经济关系不感兴趣，同时证实了自己声援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人民的立场。

最近几年来，苏联领导人同非洲领导人进行着频繁的接触，首先与古巴和‘前沿’国家的接触。南非的局势成了苏美高级会晤和专家进行双边磋商的课题。就此问题莫斯科所持的立场是：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不能把解决该区域问题的决定强加于南非国家，但是能促使达成这样的决定。

苏联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以美国为调停者的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共和国之间的顺利谈判。苏联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所有的谈判。谈判各方一致承认苏联观察员所起的积极作用。

正是苏联一贯呼吁依靠共同努力来解决西南非洲问题，呼吁加强联合国在政治调解中的作用，给予纳米比亚独立。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比勒陀利亚所作出的努力，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我们希望，存在于非洲大陆的一些其它复杂问题将在利益均等和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会找到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

“贵国如何评价在中美洲的和平调解进程？”

“众所周知，1987年8月，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五国总统签署了一份《在中美洲建立牢固和

持久和平途径》的联合文件。这一协定是孔塔多拉运动参加国多年来努力的结果，是全世界努力的结果。

危地马拉文件条款的实施，引起了想用武力来解决该区域危机力量的强烈反抗。它们甚至企图拼凑一个反尼加拉瓜集团，并把违反调解条件的罪名转嫁到尼加拉瓜身上。

与此同时，调查与监督危地马拉协定执行情况的国际委员会在自己的报告中承认，尼加拉瓜在执行这一协定方面取得最大的进展。

苏联欢迎桑迪诺人民解放阵线和尼加拉瓜其它政治力量为争取国内民族和睦所采取的步骤，在国际观察员的参加下进行民主选举。

苏联从一开始就支持孔塔多拉集团所做出的努力，并认为，中美洲的和平命运问题应当由其人民来解决。苏联将一如既往尽力协助和平调解过程，呼吁所有非本地区的国家也这样做。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还存在着困难，但是政治调解过程还是继续进行着。”

“经互会和欧洲共同体，看来是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联合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首先应当指出，两个最大的经济联合体之间多年来没有正式联系，这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现象。经互会成员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之间在贸易和文化联系，在解决带有全欧性质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具有传统的和丰富的经验，因此上述情况也就显得更为反常。

最近几年来，经互会成员国同欧洲共同体国家间的贸易流转总额显著增大：从1970年的74亿美元增至1983—1985年的390亿—420亿美元。

今天，欧洲共同体国家是经互会成员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共同体同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流转占经互会成员国同整个西方贸易流转的50%多。而经互会成员国在欧洲共同体国家贸易流转中约占10%。

经互会成员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之间在科技合作方面积累了不少良好的经验。例如，欧洲共同体国家购买了苏联500多项专利证，而从其它经互会成员国那里购买了100多项专利证。反之，经互会成员国积极利用来自共同体国家的先进工艺和专利证。

由此可见，在欧洲东西方之间的经济、科技合作已成为现实。这里我们说的是要使这个合作变为稳定和持久的，就要通过相应的组织结构来巩固它，赋予它真正的全欧性质。

经过多年谈判，最终签署了经互会和欧洲共同体之间建立正式关系的联合宣言。

联合宣言的签署是世界新政治和新经济形势的反映，是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扩大多边性事务联系日益增长的反映。双方表示愿意在两方感兴趣的领域中发展合作并促使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

现在，为了实现巨大的全欧方案正在开辟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制订环保纲领，建立核电站安全和发生事故预告体系。

科技进步领域中也同样为合作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双方很重视加快发展速度：经互会成员国在截至200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内进行活动，而西欧国家在‘尤里卡’计划范围内进行活动。”

“参加经互会的不仅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也有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是否拉平它们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

“拉平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使其接近的过程，已将近35年了。这是一个按计划进行的过程，并按民族经济的可能性和其具体条件发展的。

战后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仅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建设和交付使用了将近500个工业企业，使这些国家在60年代就进入了工业发达国家的行列（按联合国划分的级别）。实际上，这些国家的许多部门是重建的。国民收入结构中，工业的比重增大了。

如果在经互会成立的初期，经互会欧洲成员国中比较发达的国家同不够发达的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为3.1: 1，而工业生产为5.1: 1，那么，今天这个差别缩减了1—2倍，相应为1.5: 1和1.7: 1。

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系列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也改变了。比如，30年前，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的出口主要是原料和一些实用商品，而机器和设备的出口量少得可怜，甚至就根本不出口。今天，这些国家机器和设备的出口比重占30—50%。

在其他大陆上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经互会欧洲成员国的帮助下，首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古巴和蒙古建设了近80个国民经济项目。在贸易发展方面予以它们优惠待遇。

其结果是，古巴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较之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发展得更快。如果经互会成员国在1917—1985年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4%，那么古巴共和国为7.3%，而蒙古人民共和国为8.9%。

经互会成员国通过的截至200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说明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在过渡到一种新的协调一致的科技政策。综合纲要的工作将不取决于古巴和蒙古交纳资金的多寡，它们同样将获得共同进行的科技研究结果。

这些国家参与纲要的实施工作不只限于得到帮助。它们的经济和科技潜力允许它们为完成这一纲要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古巴在生物工艺这一领先学科中成功地进行着合作。

经互会工作的经验证实，无论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它有可能把它们的利益连在一起。”

“贵国对创办联营企业的初步经验有什么看法？”

“在苏联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联营企业，参加联营企业的国家有：西德、芬兰、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瑞士、印度和其它国家。现在正在按新的方案进行会谈。

对一些在最初阶段看来是极其复杂的问题，生活也开始给予答复了。比如，外国伙伴对外汇自负盈亏原则的不满在减少，即，这些企业有义务以出口收入来弥补所有外汇支付。此外，一些企业甚至同意把部分利润用于在苏联购买必要的商品。

招用苏联工作人员的手续原来也并非困难。例如，苏印合办的‘德里’饭店中有28名苏联工作人员肩并肩地同印度同行一起工作。

实践要求取消外方参营比分（49：51）的限制。在合营企业中工作的董事会外籍董事负责检验产品质量、出口、技术政策等。

全苏对外贸易科学院开始培训联营企业中的苏方领导人员。除此之外，还建立‘生意学校’，在学校讲授和听课的不仅是苏联人，还有外国人。举办了交流类似企业工作经验的讲习班。苏联表示愿意同感兴趣的国家签订相互保障资本投资的协定。

当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以往一样，共同制订的方案缺乏

技术经济依据。核算和报表制度的标准和税金制度要求规定得更明确一些。

看来，未来将会丰富联营企业活动的实践。在伙伴互利的基础上，在双方国家的支持下，联营企业的活动可以达到更大的规模。完全有理由认为，在1990年，联营企业活动将成为苏联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要的和独立自主的渠道。”

“苏联和平基金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其活动基本方向有哪些？”

“在50年代，世界和平拥护者运动不断壮大。苏联人主动地向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寄来了为反对军事威胁而斗争的捐款。捐款的数字与日俱增，因此通过了一项决定：为了对这些资金进行严格登记和监督其开支，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组织——苏联和平基金会。参加创建基金会的有：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苏联妇女委员会、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基金会的正式创建日定为1961年4月27日。

在过去的年代里，将近1亿人参加了该基金会。参加该会的不仅是一些单个的公民，还有整个家庭和劳动集体。捐款是通过邮政和苏联国家银行分行汇给苏联和平基金会的。除了现款，基金会还收到珍贵物品、书籍、学校文具用品、玩具……

基金会是怎样支配这些资金的呢？基金管委会向为和平而斗争的社会组织发放资金。这些社会组织举行国际性的反战集会，向国外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同别国反战运动人士会晤，接待来苏联的外国代表团。

苏联和平基金会活动的主要方向，是帮助遭帝国主义侵略和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许多苏联人在向基金会捐款时，经常具体地指出钱是给谁的。例如，‘为援助尼加拉瓜儿童’、‘给予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黎巴嫩居民和巴勒斯坦难民’。

基金会向遭受严重旱灾的埃塞俄比亚居民、受到严重震灾的墨西哥人民给予了援助。

苏联人民向基金会捐款是他们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为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众所周知，苏联参与许多宇宙空间
研究计划。是否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一
下这些研究的前景？”**

“至今为止，近地宇宙空间的研究乃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这种研究不仅同近地空间的‘自我感觉’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对地球上的生命有着直接联系。‘国际寰宇’方案是太阳—地球星际物理领域中综合试验的重点。目前，参加‘国际宇宙公司’考察计划的专家们同苏联学者一起进行研究。

同时准备将自动站发射到小行星带并着陆在个别行星上。苏联学者向外国同行提出讨论研究火星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建立能长期不间断活动的火星车，把火星上的土壤和许多其它样品带回地面。

计划借助于苏联的运载火箭把新轨道观测站送入太空。这些轨道观测站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观察以前看来是根本无法观察的遥远的宇宙。

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关心从宇宙考察自然资源。在密切的合作下，开展研制轨道站上必要的测量仪器和对宇宙视频信息进行自动处理的手段。

宇宙材料科学试验成了在‘国际宇宙公司’范围内共同工作的有前途的方向。许多人认为在失重状态下可以制造数以百计的新材料。

可以说在今后几年将会制造出不仅是科研方面的，而且是工业方面的工艺装置的模件。

这就是和平征服宇宙共同纲领的一些方面。”

苏联: 一百个问答



新闻社出版社

1989·莫斯科

СССР: 100 ВОПРОСОВ И ОТВЕТ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Цена 60 к.

0802010203

© 新闻社出版社, 1989



苏联：

一百个问答

竞争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经营原则？

苏联是如何拟订新法律的？

非正式青年团体是什么？你们怎样对待它们？

苏联的人口前景如何？

苏中关系发展的情况如何？